

ISSN 1817-2962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修平  
人文社會學報

第二十一期

修平科技大學編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九月出版



#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第二十一期

修平科技大學 編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九月出版



---

# 第二十一期人文社會學報中文目錄

1. 白靈長詩中反諷修辭之運用 ..... 宋友文 1
  2. 大二英文菁英班實施成效之研究 ..... 吳幸玲 21
  3. 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黑色幽默語言 ..... 許嘉雯 31
-

---

---

# Contents

1. **The use of the rhetoric of irony in Bai Ling’s long poem** ..... You-Wen Song 1
2. **Implementation of an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Class at a University  
in Taiwan** ..... Hsing-Ling Wu 21
3. **Black humor style of Wang Xiao-bo’s ‘ “The trilogy of times”**  
..... Chia-Wen Hsu 31



# 白靈長詩中反諷修辭之運用

宋友文

## 摘 要

中生代詩人白靈（1951~），以長詩崛起於詩壇，因其科學跨界文學的身份受人矚目。白靈長年筆耕不輟、熱衷新詩教學、推廣小詩運動、並編纂詩選詩集，其展現的多元面貌不容小覷；是以本文歸納白靈長詩語料，從介紹詩人白靈與反諷修辭開始，界定了長詩的定義，與解釋長詩的限制，爾後分為兩部份，其一整理各家對於「反諷修辭」的認知；其二深入分析白靈現代詩語料中，對於反諷修辭法的運用，以及研究運用此種修辭法所產生的美學效果，以期讀者開拓對白靈詩歌的不同觀點。

**關鍵詞：**白靈、長詩、反諷、修辭、新詩。

# The use of the rhetoric of irony in Bai Ling's long poem

You-Wen Song

## Abstract

Bai Ling, the poet of the Mesozoic Era, is good at writing long poem, and that is why he became famous in the Parnassus. Although he is a chemical professor, he likes literature most, that is another reason he became famous. In his life, he still writing poem, teaching poem, spread the mini poem movement, compile the selected poems and poetry. His contributions can 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generalize the corpus of Bai Ling's long poem. First, author introduce Bai Ling and rhetoric of irony., defin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long poem, and explain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ong poem. Secondly, you can see the various idea for the rhetoric of irony. Thirdly, author analyzing the use of the rhetoric of irony in Bai Ling's long poem, and thinking that can show what aesthetic effect in the poem. After reading this paper, author hope that readers can develop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Bai Ling's poetry

**Keywords:** Bai Ling, long poem, irony, rhetoric , modern poetry.

## 一、前言

白靈，本名莊祖煌，西元 1951 年生，被歸類為 1949 年戰後出生的中生代詩人、或後現代詩人，自 1970 年開始寫詩，1973 年開始在詩刊發表作品，現任臺北科技大學化工系副教授，著有《後裔》、《大黃河》、《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女人與玻璃的幾種關係》、《愛與死的間隙》、《昨日之肉》等詩集，《給夢一把梯子》、《慢活人生》等散文集，詩論集《煙火與噴泉》、《一首詩的誕生》、《一首詩的玩法》與《一首詩的誘惑》一系列的著作，作品曾獲中國時報敘事詩首獎、創世紀詩創作獎、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等十餘項<sup>1</sup>，曾編輯年度詩選及擔任各級文學獎評審，現活躍詩壇，並致力於詩的教學推廣工作。

作為一種創作手法，反諷之運用能使語言活潑多變化，令人回味無窮，並能以「正言若反」的筆法側面、甚至反面表達情意思想，以收到表達效果。「反諷的特徵，即字面意思與背後意義保持著一定的差距（張力），亦即『說此言它』的『口是心非』<sup>2</sup>」，筆者觀察中生代詩人白靈的作品，發現在其長詩中多處運用反諷修辭，於是加以整理分析，企欲得出「白靈長詩因為運用反諷修辭，而得到怎麼樣的美學效果」的結論。

長詩，一般定義在五、六十行以上的詩作即可稱之<sup>3</sup>，其創作手法不同於短詩，「短詩重在意象的精鍊和文字的凝縮，能夠以最短的文字表達一個特殊的意境，或是弦外之音，便是好詩。長詩就有所不同了，**長詩裡頭想要表達的東西是思想，在意象的經營上比較繁複，需要有良好的形式來串連作品的中心思想**<sup>4</sup>。」短詩以意境取勝，長詩則環繞在中心思想的經營上，諸如寫法是否合理、是否將文學的藝術展現出來等等，討論的方向不僅限於意象的分析而已。

既然長詩的討論面向廣，爭議於焉產生，包括詩意是否在鴻幅巨製下被稀釋、句法散文化、或作品偏重事實而流於敘事等議題，「長詩」之所以為詩，除了意象的經營需要環環相扣、語言須具備詩意之外，形式與手法也必須做一些調整：在形式方面，出現了以數字編排成為「組詩」的形式，或單獨為短詩，卻與整體環環相扣的「詩系」

<sup>1</sup> <http://www.cc.ntut.edu.tw/~thchuang/body.html> 白靈文學船

<sup>2</sup> 陳仲義：《現代詩技藝透析》（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30。

<sup>3</sup> <http://www.taiwanpoetry.com/phpbb3/viewtopic.php?p=66820&sid=8e01dafdfbd76a407193b05e9a83ed48>  
臺灣詩學·鼓吹鼓詩論壇—分行詩發表區的投稿原則

<sup>4</sup>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7%99%BD%E9%9D%88%20?iframe=true&width=100%&height=100%>  
教育維基--學習加油站--白靈條目

<sup>5</sup>；在手法方面，長詩藉助小說、戲劇的故事呈現方式，注重佈局與張力，希望通篇能一股作氣，產生連綿不絕的高潮與亮點，以展現氣勢或強調敘述的重點。又或者，在眾多詩篇中想要脫穎而出，需要反常以吸睛，於是「反諷」的語氣與筆法便成為選項之一，倘若運用得宜，成為傳唱的佳作機會亦可能提升，然要如何運用？便考驗作者的匠心與讀者的慧眼。白靈詩作眾多，綜觀其詩作，短詩以意境見長，長詩則在中心思想上著墨，白靈運用反諷技巧承載詩作的中心思想，營造出特殊的況味，而值得深入探究，故本文挑選長詩作為觀照的對象，聚焦「反諷」手法，探討白靈詩作。

與本篇相關的白靈研究資料擷取、概述如下：

- (一) 專書：古繼堂《臺灣青年詩人論》<sup>6</sup>、《閱讀白靈》<sup>7</sup>。
- (二) 單篇評論：蕭蕭〈白靈的心靈關照與意象表現〉<sup>8</sup>、林耀德〈鐘乳石下的魔術師：簡介白靈的詩觀與詩作〉<sup>9</sup>。
- (三) 學位論文：郭美君《白靈及其詩作研究》<sup>10</sup>、張秀絹《白靈新詩研究》<sup>11</sup>，李明融《白靈新詩創意研究》<sup>12</sup>。

<sup>5</sup> 參見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臺北市：揚智文化，2004年7月初版一刷），頁338：「詩系結合了短詩的抒情性以及單篇長詩綿長的敘述性。詩系裡的每一首詩都是獨立的短詩，另一方面，每首短詩是整個詩系的環節，整體與個體是一個有機體。」

<sup>6</sup> 古繼堂：《臺灣青年詩人論》（臺北市：人間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頁121-137。以「充滿大黃河意識的白靈」為小節標題，詳細精彩的介紹了白靈的前半段成就，第一個部份介紹了白靈與《後裔》，並點出白靈詩論的重點；第二個部份以《後裔》與《大黃河》中的詩作詮釋、分析白靈詩的精采處與特徵，接著進入第三本詩集《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告訴讀者白靈科技詩的鮮明特點，第三個部份著重於白靈蔚為人知的「長篇敘事詩」，以〈大黃河〉、〈圓木〉為例做了一番詮釋。

<sup>7</sup> 黎活仁、楊慧思、楊宗翰主編：《閱讀白靈》（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年7月一版）。為評論白靈的全集，集結了2010年12月18日在對岸「白靈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上發表的二十篇關於白靈詩作的論文，包含了各個面向與套用理論的分析，如「巴什拉詩學」、「童詩」、「新詩教學」、「語文修辭」、「哲學」、「生態」等。

<sup>8</sup> 收錄於白靈《愛與死的間隙》（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頁3-24。以「心靈關照的冷凝意象」和「人間關懷的熱切意象」兩小節重點，加強白靈詩作的特徵，並舉《愛與死的間隙》之中作品例證，兼顧學術與閱讀兩面。

<sup>9</sup> 林耀德：〈鐘乳石下的魔術師：簡介白靈的詩觀與詩作〉（《文藝月刊》196期，1985年10月），頁42-54。從整理詩觀到印證詩作、從長詩評到短詩，將白靈多方觸及的創作與評論、形式與內容的多變樣貌表露無遺，自成一體的使人初入叢林，便能了解百變白靈的面貌。

<sup>10</sup> 郭美君：《白靈及其詩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回流中文碩士論文，2008年。

<sup>11</sup> 張秀絹：《白靈新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年。採敘事學理論分析白靈詩作，對於白靈長詩中的手法以及意識型態著力甚深。

<sup>12</sup> 李明融：《白靈新詩創意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11年。

以下先解析反諷修辭，再舉詩例證明之。

## 二、反諷修辭的各家說法

### (一) 反諷與倒反的關係

反諷，即表象與事實相反的表達方式<sup>13</sup>，是表象和事實的對比，包括：表面講的是一件事，骨子裡指的是另一件相反的事；以及事與願違的矛盾事實。前者即言詞的反諷；後者名場景的反諷。而「倒反」修辭格，僅指言辭的反諷，而不包括場景的反諷在內。所以「倒反」就是言辭表面的意義和作者內心真意相反修辭法。表面讚賞，其實責罵；表面責罵，其實讚賞<sup>14</sup>。

由上段文字得知，「反諷」的範圍較大，涵括了以下兩種<sup>15</sup>：

1. 言詞的反諷，即意與言反的矛盾語，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反話」、「口是心非的言詞」，言辭表面的意思和內在蘊藏的真意恰恰相反。
2. 場景的反諷，即事與願違的矛盾事實，如設計陷害人反而幫助了對方，偷雞不著蝕把米等。尤其是在小說戲劇裡，安排經營反諷的情節，常充滿滑稽諷刺的意味。然，就用法來看，「反諷」與「倒反」二者所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一致的，蔡謀芳《修辭格教本》中提到：

「倒反」之意就是：表面所說的話，與實際所要表達的意思相反。換言之，「反面說話」只是作為一種表達的技巧，而非其目的之所在。因為如此，所以它與「說謊」是不同的。「說謊」之目的在隱藏真相、實意；「倒反」並無隱藏真相、實意的企圖，只是藉反面的方式，間接表達意思，使其所表，呈一種曲折、含蓄的趣味而已。這種修辭格經常被用為一種「諷勸」的技巧。因為其方法有間接、曲折的特性，所以能造就一種委婉、含蓄的效果。專就此一功能而言，它在修辭學上又有「反諷」一名。意義就是：藉「倒反」以達「諷勸」目的之修辭技巧<sup>16</sup>。

蔡說之「倒反」，不同於說謊，卻等同於「反諷」，「倒反」是手法，而「反諷」則是語言背後所要達到的目標——「諷勸」，如同《詩經》傳統中「怨而不悱」的精

<sup>13</sup> 沈謙：《修辭學》（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10月），頁184。

<sup>14</sup>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頁321。

<sup>15</sup> 整理自沈謙《修辭學》，頁185。

<sup>16</sup> 蔡謀芳：《修辭格教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9月），頁75。

神，委婉的點出現實中不夠完美的地方，而讓觀者作為警惕，並思索改進之道。

## （二）各家說法之比較

談論、研究修辭學各家的學者，對「反諷」與「倒反」修辭格的解釋大同小異，綜觀沈謙、黃慶萱、陳正治、蔡謀芳等人說法，皆八九不離十，是以整理出下方表格，做一總覽比較。

表一：修辭學者對倒反與反諷修辭格界說

| 學者<br>(按姓氏筆<br>劃排序) | 著作                | 修辭格名稱 | 分類                              | 原則  | 作用          |
|---------------------|-------------------|-------|---------------------------------|---|-------------|
| 沈謙                  | 修辭學 <sup>17</sup> | 反諷    | (依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之說)<br>1.倒辭<br>2.反語 | 1.表現幽默感<br>2.具有警惕性<br>3.流露親切感<br>4.避免會錯意  |             |
| 黃慶萱                 | 修辭學 <sup>18</sup> | 倒反    | 1.倒辭<br>2.反語                    | 1.消極原則<br>(1) 倒反不可流於尖刻<br>(2) 倒反不宜流於煽動<br>2.積極原則<br>(1) 注意事實和表象間的對比<br>(2) 要同時使人悲戚與愉快<br>(3) 必須表現一種幽默感<br>(4) 必須具有使人反省的效果 |             |
| 陳正治                 | 修辭學 <sup>19</sup> | 倒反    | 1.正意反說<br>2.反意正說                | 1.應含義明確，避免誤解  | 1.語言反常，引人注意 |

<sup>17</sup> 沈謙：《修辭學》，頁 184-201。

<sup>18</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 321-336。

<sup>19</sup> 陳正治：《修辭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月），頁 160-169。

|     |                            |    |                               |                                       |   |
|-----|----------------------------|----|-------------------------------|---------------------------------------|---|
|     |                            |    |                               | 2. 力求語言幽默、風趣<br>3. 根據內容性質及彼此相關        | 2. 可使語言活潑、生動，令人回味<br>3. 可以增強思想情意，收到表達效果 |
| 蔡謀芳 | 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 <sup>20</sup> | 倒反 | 1. 簡易倒反<br>2. 加重倒反<br>3. 轉移倒反 | (判斷線索)<br>1. 上下文意<br>2. 邏輯關係<br>3. 語氣 | 1. 褒貶<br>2. 狎謔<br>3. 極言<br>4. 謙抑        |

由上表可知，雖然辭格有「倒反」和「反諷」兩種名稱，但在原則與作用上卻是殊途同歸，不外乎是表達並加強思想情意的一種文學手法，而使得語言反常引人、幽默風趣、活潑生動而有味。是故本文將以反諷為主、倒反為輔，相互參照而取其大，並用以詮釋語料，分析詩歌。

### 三、反諷修辭在白靈長詩中之運用

#### (一) 言語的反諷

##### 1. 正話反說的「倒辭」

「倒辭」係指由於當時情境難以直言無隱，於是用相反的詞語來表現本意和真情。倒辭一般較無諷刺性，反而多所稱揚，雖有調侃意味，卻幽默詼諧<sup>21</sup>。陳正治認為：「對正面的、肯定的內容，以反面的、否定的語言來表達<sup>22</sup>。」就是所謂的「倒辭」。

筆者認為，「倒辭」手法的使用較為委婉，諷刺的意味沒有「反語」那樣強烈明顯，卻仍舊能夠點出事實，在字裡行間顯現出「溫柔敦厚」的美刺傳統，如〈一九八四——歲次甲子〉<sup>23</sup>一詩：

而波斯灣旁，兩伊正以炮彈  
互道：「新年早安」

<sup>20</sup> 蔡謀芳：《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頁72-78。

<sup>21</sup> 陳朝松：《臺灣當代新詩修辭技巧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7年9月碩士論文，頁78-79。

<sup>22</sup> 陳正治：《修辭學》，頁162。

<sup>23</sup> 白靈：《大黃河》（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86年4月），頁51-62。

槍聲仍然濃過鐘聲，占領著耶路撒冷  
 卡車炸藥是最快樂的煙火，為貝魯特  
 買來一堆過年禮物

在 1984 年元旦這天，詩人感嘆 1980 年代兵燹不斷、生靈塗炭的世界局勢：阿富汗戰爭、波斯灣戰爭，企圖獨裁專制的狂人格達費等等，使個半個地球在新年的這一天依舊不得安寧，和平與希望似乎也遙遙無期。具有殺傷力的「砲彈」與「炸藥」，居然成為「新年禮物」和「最快樂的煙火」，悲慘的情狀變成讚揚的慶祝，令人情何以堪。

中東動盪，就連非洲也無法平靜，懷有種族優越感的白人入侵黑色大陸，以自以為是的文高度「改造」了黑人的生活，卻使得黑色大陸更加黑暗而喪失希望：

為什麼剛果河乾癟得吮不出乳汁  
 （新年在地球上輪轉，什麼時候輪到我們）  
 而動物專家、人類學者都來了  
 在這裡在那裡，圍起許許多多  
 野獸的保護區  
 「可是，白人先生，我們不要象牙呀」  
 黑人以舞蹈憤怒著  
 （嬰兒啼叫蒼蠅飛舞跳蚤四鑽）  
 可是母親、非洲，親愛的吊鐘乳  
 我們只想射殺野豬或者雉雞什麼的啊 …

象牙，帶動了觀光效益，並賺飽了商人的口袋，可是對於當地人卻是毫無助益的奢侈品，「野生動物保護區」像是保護了生態環境，卻斷送了當地人生活的的經濟來源，使得他們變得更加貧窮且無法生活。詩中「可是，白人先生，我們不要象牙呀」一句，顯得既無奈又悲哀。然在非洲水深火熱的同時，美國在做什麼呢？

一顆大燈球隨著鐘響正好  
 向新的一年緩緩下降  
 歡聲喧嘩了五十萬人  
 幾萬頂帽子將紐約高高拋起

同性戀們哭泣地擁吻著  
 ( AIDS 希望有更多的患者 )  
 .....  
 幾百萬處女膜一夜間陷落  
 自由萬歲，疱疹萬歲！

雖然舉辦跨年派對，大夥開心慶祝新的一年降臨，但其實其中存在著許多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例如海外的戰爭、同性戀的議題、愛滋病的問題，和所謂「自由」、「狂歡」所帶來的「性病」問題，這些問題被點出來，讓一九八四這個新年，過得沉重而不再輕鬆。

「世界的歷史在詩中匯成一幅幅畫面，讓人去審視和反省歷史。有苦難，有壓迫，有反抗，有一雙無形的手在推動世界的運轉。一邊是戰爭，一邊是眼淚，還有生活中的愜意與狂歡<sup>24</sup>。」詩人將一個簡單的新年，以一些不忍卒睹的問題詮釋，於是「在對比中道出了歷史時刻的荒誕與殘酷<sup>25</sup>」，隱隱調侃著人性的險惡。

反對戰爭的詩，又如〈爸爸，整個中國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sup>26</sup>，總計五節、一百二十五行，通篇以一個小孩子的視野高度，呈現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侵華的殘酷暴行：

插秧似的，砲彈一支支  
 插在  
 我課本的地圖上  
 轟——的一響火光迸裂  
 爆起一串串血的硝煙  
 中國古老的城鎮啊  
 在人潮前面一座座  
 立體起來，搖晃著  
 用城垣、和高牆

<sup>24</sup> 韓紅豔：〈戲謔與荒誕：一種反諷的人性拷問——白靈詩歌中「審醜」的批判意識〉，《閱讀白靈》（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年7月），頁239。

<sup>25</sup> 同上注，頁240。

<sup>26</sup> 白靈：《白靈世紀詩選》（臺北市：爾雅出版社，2000年6月），頁81-89。

過濾下一些屍首  
 隨即在人潮後頭  
 被戰火一一、扳倒  
 爸爸，整座中原像極了  
 我們家那張  
 被炸爛的書桌

「孩子最是真無邪，不會說謊也不會文飾，詩人企圖真實地還原日軍侵華的暴行<sup>27</sup>」，在詩的一開頭，詩人便寫道「砲彈像稻子插在課本的地圖上」，孩子不了解戰爭的殘酷，只能以天真的以自身僅有的經驗來描述殘酷的現實，然稻子是養育生命的糧食，砲彈卻是殺人不眨眼的武器，兩者之間的「不相稱<sup>28</sup>」，突顯出戰爭的無情之處。

「爸爸，只有春天不懂得逃亡/櫻花和梅花夾雜生長/我們卻在/破廟中，大樹下/農舍裡，隨著老師/和淚水/研讀自己的歷史/每一頁都是/刺刀舉得高高的條約/和羞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春天並不會因為世間正在戰爭而缺席，因此「不懂得逃亡」，反而還很寬容的讓代表大和民族的櫻花和中華民族的梅花「夾雜生長」，而人類的自私自利，卻在「條約和羞辱」中表露無遺，日本軍國主義強勢的向外擴張，中華民族的孩子們只能經濟條件欠佳的「破廟、農舍裡」，和著淚水讀歷史，雖然心痛，卻十分無奈。再讀第二節後半段：

離開了老家——媽媽跟妹妹/現在正向哪條路顛簸？/她那「阿彌陀佛」的佛號/  
 終於壓不住砲聲/唸珠也圍不住戰場/我們的恨啊她要圍/也圍不住了/爸爸，那批  
 「黃色動物」/用和服裹住我們的東北/用馬蹄巡邏我們的中原/撒炸彈，為江南  
 施肥/開飛機，幫我們照顧天空/駕著軍艦在長江風光/斬南京的頭/剝武漢的皮/  
 在長沙在廣州/到處放煙火/

就算高聲唸禱「阿彌陀佛」，慈悲為懷的宗教卻圍不住戰場，而因民族氣節興起抵抗外侮的「恨」，也圍不住了，「巡邏」、「施肥」、「照顧天空」、「放煙火」等，原本應該都是仁政，但由於「和服」、「馬蹄」、「炸彈」、「軍艦」與「飛機」等戰爭的意象，事件就不再平凡，詩人藉此表達出哀傷沉痛的心情，掀開了歷史血淚斑斑的一頁。

<sup>27</sup> 張秀絹：《白靈新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年），頁100。

<sup>28</sup> 參見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不相稱的美學》，不相稱來自於1.「不搭調」的意涵2.不合邏輯的因果3.「非常理」的組合4.對於既定反應的諧擬。

日本在二戰時期蹂躪中國老弱婦孺的暴行，在詩中可見一斑：

可是爸爸，您沒看見嗎  
 它們繼續舉高刺刀  
 玩弄我們的嬰兒  
 用馬靴不斷幫我們孕婦  
 「迅速」生產！  
 爸爸，就在昨夜  
 又一群女同學  
 被它們啊  
 汗穢的小眼睛  
 拉開了雙腿…

燒殺擄掠、將領舉辦殺人比賽等等慘無人道的事實罄竹難書，但詩中的主人翁——一個被侵略國的小孩卻是無能為力，只能不斷的哭訴：「沒有！沒有！/爸爸，整箇中國/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這是何等悲愴的吶喊啊！

「恰當的使用『倒反辭』，並不是抹殺『真意』，只是設法促使對方進一步去反省，去尋找這個隱藏在文字反面的『真意』，並且享受發現後的愉悅與痛苦罷了<sup>29</sup>。」若是直言無隱，文字的趣味便失色不少，而換個角度描寫才能創造出更多的詮釋空間，作品也因此產生美感，並且活絡起來。對於戰爭，這世間人為的苦難，白靈雖頗有微詞，但仍按奈下澎湃的情緒，以理性的文字挖掘事件的真相，好讓讀者自行體會文字背後的「真意」——那些愉悅與痛苦情緒。

## 2.反話正說的「反語」

「反語」係指故意把不滿、輕視的情緒隱藏起來，表（字）面上用正經的言語來稱揚，間接表達心中的嘲弄諷刺<sup>30</sup>。陳正治認為：「對反面的、否定的內容，以正面的、肯定的語言表達<sup>31</sup>。」就是所謂的「反語」

筆者認為，「反語」的手法，尖銳、明顯且強烈，作者對一件事的嬉笑怒罵之情

<sup>29</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 331。

<sup>30</sup> 陳朝松：《臺灣當代新詩修辭技巧研究》，頁 80。

<sup>31</sup> 陳正治：《修辭學》，頁 165。

可見一斑，如〈魔術師——S-95 奶粉事件的聯想〉<sup>32</sup>一詩，批判無良商人所生產出的黑心商品，遺害社會的現象：

他們還保持老祖宗仁慈的傳統/我們的魔術師，只向人們收取微薄小費/便使口渴的人可以喝黃樟素/呼吸困難的人可以吸收戴歐辛/嘴饞的吃了黃麴毒素保證沒事/如果生了病，請一定/一定要相信我們的魔術師/用沒有消毒的塑膠針筒才能早日康復//真個是無所不能，我們的魔術師/只要他指尖輕輕一點/包子可以更白，蝦仁長保新鮮/至於韭菜包心菜、小白菜芥蘭菜/  
放心，統統蟲子不長一隻//甚至，我們的魔術師，甚至只要搖搖/工業酪素，便唏嘩嘩瀉成燦白的奶粉/包裝成 S——95，餵我們孩子/哪個不是，渾渾圓圓的小胖豬？

陸有「三鹿奶粉事件」、臺有「塑化劑風暴」，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危機使得人心惶惶，只要還有投機取巧的商人在，這些社會事件就無法避免。白靈稱黑心的「魔術師」其實是「仁慈」的，因為收費十分低廉，讓普羅大眾都能「享受」到他們的魔術，這魔術師「不變小白兔」、「不玩美女分屍」，而是發明了新的橋段，舉凡「黃樟素」、「戴歐辛」、「黃麴毒素」、「未經消毒的塑膠針筒」，和摻了防腐劑的食物食品，都是魔術師變戲法的範圍，但其實展現這些魔術並非是造福人群，反倒是危害人體健康，造成社會莫大的恐慌。因此見到這一切的詩人不得筆伐一頓：「所以說，真是好，我們周遭有這麼多/世界一流水準的魔術師，技術高超/法律揪不出，監獄關不住/日日夜夜賣命為我們表演，免費的——/請，請他們不要怯場，千萬要繼續//對了，大家一起來，鼓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呀！

以詩作抗議社會事實的，尚如〈剝虎大師〉<sup>33</sup>一詩，人們缺乏環保概念，濫殺野生動物，卻還義正詞嚴的找了個替死鬼承擔所有的過錯，那個人就是詩中主角「剝虎大師」，詩的剛開始詩人便指稱「剝虎大師其實是冤枉的/他多情，而且愛虎，偏偏沒人知道/大家只誇他技術好：目無全虎/.....沒有一滴血會流下桌面//當然也不會有一點垃圾會產生」。

如庖丁解牛一般厲害的剝虎技術，將一隻隻的老虎「完全利用」，將「血呀、骨啦、肉啣、鞭啊，統統分給了人們」，還博得了「愛臺灣」的稱呼，因為「不會有一

<sup>32</sup> 白靈：《大黃河》，頁 95-98。

<sup>33</sup> 白靈：《大黃河》，頁 99-103。

點垃圾會產生」，十分的「注重環保」。人們指責他，剝虎大師一肩承受，因為老虎需要他：

剝虎大師最看不起保護動物的人了/森林一批批倒下，山岳被剖開/衝進去柏油公路與機器猛獸/也不問老虎願不願意，讓牠們奔走於/動物園，馬戲團，以及一小時就可以/走完的草原。試問：那隻老虎會喜歡？/——難怪牠們都想做「人」！/要在來日虎年時，投胎，轉世！/便託他——剝虎大師/倣效西藏天葬的法子，分屍之後/散食於天際，在世間來個屍骨無存//剝虎大師是冤枉的/你看老虎們還在排著隊，搖尾求他超渡呢/他的確是冤枉的，他要奮鬥到底，而且/而且四年後，準備上漢城奧運/(老虎是那次運動的標記)/解說現代老虎的生理和心理，以及/孟加拉虎，靈魂如何昇天的故事

「把殘忍說成仁慈，把血腥說成超渡，人性的公道已經缺失不堪<sup>34</sup>」，〈剝虎大師〉反面陳述了人性的矛盾與扭曲，點出了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已經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本詩「批判了人類因慾望而破壞生靈，更諷刺文明人對『剝虎大師』的指摘，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於此對於文明人是雙重的批判<sup>35</sup>」，實在值得深刻反省一番。

「強烈的正話反說或反話正說常常起到一種哭笑不得的諷刺效果<sup>36</sup>。」在〈一億隻 SARS 的修煉方式〉<sup>37</sup>中，詩人以 SARS 病毒自述的方式，呈現其在寺廟裡「修行得道」的過程：

我承認  
我就是那口濃痰  
「阿屁！」一聲不知被誰  
咳在龍山寺面街的  
那堵牆上  
整面牆，銅鑼一樣地震撼

2003 年的 SARS 事件令人記憶猶新，這種「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的病毒，擴

<sup>34</sup> 韓紅豔：〈戲謔與荒誕：一種反諷的人性拷問——白靈詩歌中「審醜」的批判意識〉，《閱讀白靈》，頁 247。

<sup>35</sup> 李明融：《白靈新詩創意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91。

<sup>36</sup> 陳仲義：《現代詩技藝透析》，頁 34。

<sup>37</sup> 白靈：《愛與死的間隙》（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4 年 9 月初版），頁 174-178。

散到全球二十五個國家，奪走了七百七十五條人命，報導認為 SARS 嚇垮了房市與股市，經濟於是衰退，也帶給人們莫大的恐慌，甚至暴露了當局對於防疫工作的緩慢<sup>38</sup>。然而病毒是如何擴散開來的？起因便是缺乏公德心的人們隨處吐痰所造成的，輕蔑的「阿屁」一聲，在神聖的龍山寺前、觀世音的腳底下吐了「不合時宜」的一口痰，雖然牆感受到強烈的震盪，但人們卻無視於製造髒亂的嚴重性，「響了三天沒有誰/...../沒有誰感受到我的威力」，於是才讓病毒有機可趁：

一肚子不合時宜才吐得出的一口  
痰  
我躺著歪著不洗澡不穿鞋  
跟鎮日趴趴走的地球遊民沒兩樣  
自從被阿 Q 吐到  
中國的臉上  
一世紀都沒有得到回應  
我們沿著一千座廟宇的牆壁  
默默游 走

邈邈且髒亂的病毒，在充滿神性的地方修煉，但「修禪的方式是在/臉上長滿瘡疔/在褲底窩藏跳蚤」，終於在集眾毒於一身之後「卡住所有華人的喉嚨，粘稠地/滾動，像一億條瘋狗/等待被吐出/飛滿天空/噬咬/所有不潔不淨不洗手沒有免疫力/的東亞病夫/的身體/和政治」，世界於是被病毒統治，傳染病的散播也影響了人們的健康與政治的角力。詩最後的段落，病毒「參透」了佛法，化作無相，潛藏在每個角落，人們於是無處可逃：

靜靜打坐，等待觀世音隔空拈指  
一彈，嚙地一聲將我擊出  
朝你飛去  
化作不垢不淨 無眼無耳無鼻無舌  
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的

<sup>38</sup> 葉立斌：〈追新聞/2003 年的 SARS 病毒席捲全球 吃垮經濟〉，NOWnews – 2012 年 9 月 27 日，2012.12.9 最新檢閱。

一億隻 SARS，張  
 開無相大口  
 吞  
 沒你

上文所舉的「詩充滿超現實的想像，以驚異的語言意象，嬉戲的態度撞擊讀者，凸顯根植人性的迂腐、病態的政治、荒謬的現實，極盡嘲諷之能事<sup>39</sup>。」又葉朗認為：「藝術中的『醜』不僅不低於『美』，而且比『美』更能表現生命的力量，更能表現人生的艱難，更能表現自己胸中的勃然不可磨滅之氣<sup>40</sup>。」不美的事實經藝術的包裝，似乎也變得美多了，也因此較能為人們所接受，在這些嚴肅的議題中，「反語」的使用除了令人耳目一新之外，對於改進現況也多了一些可能。

## （二）場景的反諷

場景的反諷又稱「戲劇性反諷」，多半使用在較大範圍的段落情境，乃至整首詩的人物、場景和情節等方面的手法<sup>41</sup>。在場景所描述的事件中，「事與願違」、「言語行反<sup>42</sup>」的呈現，便能產生反諷的效果。

白靈敘事長詩〈圓木〉<sup>43</sup>，依序分為「忠、太陽旗」、「孝、解剖臺」、「仁、玻璃屋」、「愛、陳列室中的會議」、「信、石井四郎寫給 GHQ 當局的」、「義、免於審判」、「和、醫學大賞頒獎典禮」、「平、第一次戰友會」八個段落，花了二百九十行的篇幅直指歷史傷痛——人體實驗品「圓木」在二次大戰時被日本七三一部隊凌虐的慘況。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中國固有的美好道德，此時卻用來當作對日軍暴行最嚴厲的指控，正標題與副標題之間，產生一種強烈的嘲諷感與矛盾<sup>44</sup>」除了標題顯示出嘲弄之意之外，詩中所描寫的軍官各各都是丑角，演出一幕幕荒誕的戲碼：

要慢細品嚐，像是：  
 用手槍觀察他們腦殼開花的方向  
 用冰寒測量支那手腳潰爛的速度

<sup>39</sup> 李明融：《白靈新詩創意研究》，頁 158。

<sup>40</sup> 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 年 1 月），頁 128。

<sup>41</sup> 陳朝松：《臺灣當代新詩修辭技巧研究》，頁 78。

<sup>42</sup> 沈謙：《修辭學》，頁 196。

<sup>43</sup> 白靈：《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8 月），頁 57-86。

<sup>44</sup> 張秀絹：《白靈新詩研究》，頁 90。

以開水燙出這群猴輩戲劇化的表情  
 以鼠疫和炭疽看他們如何  
 如何折磨死亡……  
 諸位，更重要一點  
 他們的價值全靠我們怎麼切片  
 每一具圓木都要疊出報告  
 諸君且不准有同情  
 一絲絲，掉落解剖臺面  
 他們不過兔子天竺鼠  
 活材料一堆！

自大狂妄的扭曲觀念，沾沾自喜的得意嘴臉，指揮進行不忍卒睹又慘無人道的實驗，殘酷的戰爭讓世間成為煉獄，日本在歷史上於是使中華民族又愛又恨，

更令人髮指的是「日本不但沒有對自己的侵略行徑作出道歉，而且還在美化自己的罪行<sup>45</sup>」：

麥帥先生/數分鐘真比數年短暫嗎/貴國轟散了兩座城市好夢/而我等卻記下了戰爭/——那頭怪物的千萬種表情/且寫了一卡車的報告//這是醫學史上最精采的報告!/麥帥先生啊/信不信由您/這麼多美好的標本/人類的切片/古今均不曾擁有/即使上帝/

為了免於軍事審判，主導實驗的石井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向美軍交出「實驗報告」，交換不死的條件，然諷刺的是，石井自詡為比造人的上帝還偉大的人，實令人無法接受。而在戰爭褪去之後，日本改以經濟侵略亞洲：「朝鮮和支那/一直是大日本的前院/整座太平洋/始終是我們的內湖/各位的子孫再度落實了這點/坦克開不去的/貨櫃不是運去了嗎」，這是仍舊上演著的歷史，也可以見到詩人敏銳描寫事實現況的眼光。

場景的反諷，大部分來自戲劇中的「衝突」元素，陳仲義先生在《現代詩技藝透析》書中提到：

<sup>45</sup> 韓紅豔：〈戲謔與荒誕：一種反諷的人性拷問——白靈詩歌中「審醜」的批判意識〉，《閱讀白靈》，頁 235。

衝突是傳統戲劇的核心，戲劇人物命運衝突最主要是由性格完成。現代詩所表現的衝突，雖然並不排斥社會、歷史、現實、倫理因素，但它們必須是充分心靈化的產物。現代詩的衝突主要是情感的、靈魂的、心靈的衝突<sup>46</sup>。

從〈提絲傀儡——裕仁死了〉<sup>47</sup>詩中，描寫日本裕仁天皇面對軍國主義向外擴張的瘋狂行徑時，儼然就是個被歷史操控的傀儡，無法自由的控制意志，而讓亞洲陷入黑暗：

他何曾圈太平洋當日本內湖/ 何曾拿貸款幫浦第三世界鮮血/他從未繁殖煙囪  
統治他國天空/ 更從未祭櫻花二號移植大和文化/他被牽著假裝向白種人鞠躬/  
他被供在皇宮，要八紘一字/他被牽被引，躺進靈柩中/粉飾枯槁，讓萬國前來  
朝拜/浸染無數血汁那面太陽旗/終於飄落他臉上/似人似鬼/他是個提絲傀儡

天皇，日本人心中至高無上的精神象徵，在政治上卻僅是架空而無實權、「不知握誰手中那些線」的一個傀儡，在軍國主義強勢向外擴張二十世紀初，他維持著表面上的貴族行止，「什麼都中規中矩」，卻對在日本境外踐踏生靈的軍事行動無計可施，所有的浩劫都非他心裡所想，因他只是一個被時代牽著鼻子走的傀儡。天皇至高無上的身分與被歷史定位的罵名造成衝突，在白靈的描寫中，那段血淚斑駁的歷史顯得既可恨又可憐。

〈紅頭阿三〉<sup>48</sup>也是一個例證，一個專辦喜事的紅頭道士阿三，他「醉的時候比誰都清醒」、「醒的時候比誰都迷糊」，在工作時「是X城的頭牌乩童/迎神賽會上誰有他凶猛/血就是他的語言/把七星劍來回劃自己的舌/狼牙棒猛打天靈蓋/背紮五色旗鋼針/姆指粗長棍/箭矢般，哼也哼一聲/就顫顫然飛入他的兩頰」，在工作的當時他是多麼的威風凶猛，然在脫去道袍做回一個平凡人時，卻是個社會邊緣人：

血口嚼檳榔/在酒廊裡索女人的腰/像索取一排紅標米酒/他讓老母坐在空米缸裡  
修行/他使妻子遁入理容院觀光/他在電影院把無能的酒瓶/擲向萬能的阿  
諾……/

家徒四壁、卻吃喝嫖賭樣樣精，甚至在電影院裡挑戰英雄，身為一個道長，素行

<sup>46</sup> 陳仲義：《現代詩技藝透析》，頁 39。

<sup>47</sup> 白靈：《白靈世紀詩選》，頁 77-80。

<sup>48</sup> 白靈：《愛與死的間隙》，頁 128-132。

卻不良，個性上的「衝突」於是顯現。至於紅頭阿三連結了人與鬼神之間的溝通，不知解救了多少迷惘的心靈，但對於自己的去留卻無法控制，因此陷入了空無的思考：

他的雙腳終於緊緊吸住了這大樓/拔起劍般他把樓房從地球中/拔出，朝夜空螺旋而去 ...../最後有人看到/紅頭阿三從太空中跳了下來/哈哈大笑兩聲/撞地時整座 X 城七級地震般/信心搖晃，近乎崩決//但沒有誰找到紅頭阿三的屍首/除了水泥地上/清清楚楚兩記金剛手印/深，而且空 .....

陷入空無思考的，還有〈原點〉<sup>49</sup>，這首詩是文本主角自白的遺書，文本主角是中國送到海外的留學生，因受到思想控管，要求他們繳交「交心的自白書」，「沒有思想自由」的「無人權待遇」，使他們痛苦不堪，被束縛的理想因政治因素有志難伸，致使他們學成不歸、自費生滯留美國、公費生申請政治庇護遭拒而以死明志，本詩因而展現了高階知識份子內心的絕望與掙扎，以「臺灣」、「美國」、「飛機/飛行」的自由，對比「黑夜」、「鬼魅」、「黑影」所隱喻的不自由，以「廣寒虛空中的隕石」、「(哈雷彗星)中心直徑廣達五公里的寒冷」隱喻政治一言堂的真空狀態，再以「足球無門卻努力射門」和「對靶心不斷撞擊」隱喻努力爭取自由的無效，種種最後符應至「從六倒數到 0」的組詩標題：

我的朋友，繁華令人暈旋/站在六十層這高樓/依據我的推算/六秒鐘可以到達地球表面/我將奮力張開手腳/使它延長，在背後拉出光芒//祇因沒有飛機或船隻/可充當義士，好把自由擦出火花/捲起新聞記者浪濤般的筆花/祇得稍稍偏離被算好的軌道/為後來，我那慌亂打轉的兄弟們/標出自由的原點，在這/在這北美洲的土地上/祇是六秒鐘的自由落體罷了/整個中國卻還要猶豫，猶豫多久？

「衝突以強烈的主觀敘述者身分介入，能在強度與力度上達到一種直接的衝突高潮<sup>50</sup>」衝突在現實背景的映托下，展現了存在的荒誕、靈魂的掙扎、精神的抗爭，這自我與存在、自我與自我的拉鋸，營造出「戲劇性反諷」，文本主角身在其中，「非全知觀點」的侷限，迫使他們無法逃離命運的控制，而產生人生的荒誕、毀滅式的同歸於盡。紅頭阿三的人生以死謝幕，徒留唏噓；中國被思想管控的留學生也因絕望而走上絕路，白靈以主觀敘述者的筆調切入文本主角內心，深刻的挖掘文本主角可能遭遇

<sup>49</sup> 白靈：《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頁 188-198。

<sup>50</sup> 改自陳仲義：《現代詩技藝透析》，頁 40。

到的困境，以戲劇張力十足的筆調、「不相襯」的衝突反諷口吻，刻劃出可歌可泣的詩篇。讀者透過詩人的筆尖，閱讀了滾滾紅塵的縮影，體悟了種種不同的人生。

#### 四、結論

不論是對戰爭的反諷、對自然環保議題的關懷，還是對不忍卒睹的大歷史做回顧，或者對於小人物的描繪，都可見到詩人關切現實的那顆熱切的心，恰如杜十三所評：

他（白靈）與許多以「自我」為中心或純抒情為職志的詩人不同的是，他是經常以衝撞民族的痛為「樂」、以檢驗人間的苦難為必然的詩人。但他的批判性格以從早期的「顯」走入晚近的「隱」，逐漸朝諷刺性、隱喻性、多方向性推進。……這些作品看起來是白靈式的「人間性」，其實或許就是全體華人隱忍未發的「集體潛意識」，白靈以其詩藝術作了他人所難為的最佳見證<sup>51</sup>。

在本文所提及的詩作中，白靈試圖採取巧妙的安排，運用「正言若反」、「既謬且真」的筆調書寫，並藉助戲劇長處，例如「佈局」、「張力」、「人物塑造」等元素來製造效果，在鴻幅巨製當中讓歷史事件說話，使無罪的得到解脫、有罪的成為弄臣，而非功過則待由讀者自行判斷，如同黃慶萱先生所提點的原則：「倒反不可流於尖刻<sup>52</sup>」且「必須具有使人反省的效果<sup>53</sup>。」藉由詩人的拋磚引玉，睿智的讀者便可釐清真相，進行判讀的工作，在修辭的糖衣之下，嘗到反諷言詞裡的辛辣真實。

#### 參考資料（依出版年月排序）

##### 一、白靈詩集

白靈，《大黃河》，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

白靈，《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臺北市：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8月初版。

白靈，《白靈世紀詩選》，臺北市：爾雅出版社，2000年6月初版。

白靈，《愛與死的間隙》，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

##### 二、專書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增訂五版。

<sup>51</sup> 杜十三：〈白靈詩作的時間性、空間性與人間性〉，《白靈世紀詩選》，頁19-20。

<sup>52</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331。

<sup>53</sup> 同上註，頁335。

蔡謀芳，《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

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1月初版。

沈謙，《修辭學》，臺北縣（今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10月修訂版三刷。

蔡謀芳，《修辭格教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9月初版。

陳仲義，《現代詩技藝透析》，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12月初版。

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臺北市：揚智文化，2004年7月初版一刷。

陳正治，《修辭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月二版三刷。

黎活仁、楊慧思、楊宗翰主編，《閱讀白靈》，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年7月一版。

### 三、學位論文

陳朝松，《臺灣當代新詩修辭技巧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郭美君，《白靈及其詩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回流中文碩士論文，2008年。

張秀娟，《白靈新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年。

李明融，《白靈新詩創意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11年。

### 四、網路資料（按檢索日期先後排列）

<http://www.taiwanpoetry.com/phpbb3/viewtopic.php?p=66820&sid=8e01dafdfbd76a407193b05e9a83ed48> 臺灣詩學·鼓吹鼓詩論壇—分行詩發表區的投稿原則，2012.12.8 最新檢閱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7%99%BD%E9%9D%88%20?iframe=true&width=100%&height=100%> 教育維基--學習加油站--白靈條目，2012.12.8 最新檢閱

<http://tw.news.yahoo.com/%E8%BF%BD%E6%96%B0%E8%81%9E-2003%E5%B9%B4%E7%9A%84sars%E7%97%85%E6%AF%92%E5%B8%AD%E6%8D%B2%E5%85%A8%E7%90%83-%E5%90%83%E5%9E%AE%E7%B6%93%E6%BF%9F-142230240.html> 葉立斌：〈追新聞/2003年的SARS病毒席捲全球 吃垮經濟〉，NOWnews—2012年9月27日，2012.12.9 最新檢閱。

<http://www.cc.ntut.edu.tw/~thchuang/body.html> 白靈文學船，2012.12.12 最新檢閱

# Implementation of an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Class at a University in Taiwan

Hsing-Ling Wu\*

## Abstract

As globalization spreads and the demand for English proficiency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increases,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followed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in reforming its English curriculum. Establishing graduation thresholds and obtaining certificates of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are goals set for students by most local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goals, ability-grouping of courses for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is commonly practiced. At the researcher's university, an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class was created for non-English majors in addition to advanced, intermediate, and elementary courses. This study aims to pilot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mot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on the TOEIC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lite class.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TOEIC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articipants' listening scores improved more than their reading sc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bility-grouping teaching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re provided.

**Keywords:** ability-grouping courses, sophomore English, TOEIC test.

# 大二英文菁英班實施成效之研究

吳幸玲\*

## 摘 要

由於全球化的趨勢及業界對英語能力要求的提升，台灣的高等教育採取許多措施來改革英語課程，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均採取設立畢業門檻及取得英語證照為目標。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大一及大二英文採取能力分班制是普遍的做法。本研究者所任教之台灣中部某科技大學在原有的優班、中班、普班三級之外，新增了菁英班。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測試大二英文菁英班的實施是否有效提升學生的多益成績。結果顯示學生在多益總分上有顯著進步，聽力部份的分數增加比閱讀部份多，本研究提供分班教學之意涵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能力分班課程、大二英文、多益成績。

## Introduction

As globalization increases,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rises.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job applicants is a key point for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us, obtaining English proficiency certificates which are recognized worldwide before graduating has become a goal for many college students. Although GEPT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tests are widely accepted as English proficiency measuring tools in Taiwan, the TOEIC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frequently administered internationally with more than 4.5 million test-takers every year (Robb & Ercanbrack, 1999; Miyata, 2004, Rogers, 2006). To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increase their performance on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followed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in reforming its English curriculum.

Aft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quest for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o establish English thresholds for graduation requirement in 2005,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ere forced to re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GP) curriculum. As most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courses failed to interest learners and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workplaces need, educators have sought innovative methods to meet student needs. Among solutions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required English courses, which generally sort learners according to their majors, not according to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bility-grouping teaching has become widely practiced in Taiwan (Chang, Liu, & Chen, 2006; Tsao & Hsu, 2010; Lee, 2012).

Prior to the school year of 2011,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courses at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ocated in central Taiwan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dvanced, intermediate, and elementary. Lee (2012) found out that non-English majors were generally lower i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than English majors. Though some non-English majors exhibited higher proficiency, the existing levels were not able to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advanced-level learners.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 a higher English proficiency among non-English majors, the school created an elite level for sophomore English start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1. Students who are qualified to enter the elite sophomore program obtained certificates of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CSEPT) at the CEF/B1 leve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ding another level, the elite level, to the existing advanced, intermediate, and elementary ability-grouping for sophomore English. In this study, "effectiveness" is defined as "scoring higher on the Test

---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 Since the TOEIC test includes a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nd a reading section, this study thus examines two research issues: (1) whether participants' TOEIC scores improve significantly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nd (2) whether the listening or reading section shows greater improvement?

##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nglish proficiency graduation thresholds are common throughout Taiwan. Universities generally use scores on one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tests or the locally developed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PT). Students accept such thresholds. For example, about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in Liauh (2010) agreed that the graduation threshold was necessary and ha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reshold tests. In the loc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classes are expected to help students pass these thresholds.

However, researchers in Taiwan have found that both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 in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General English curriculum (Chang et al, 2006; Tsao & Hsu, 2010). According to Chang et al (2006), about 50 percent of the 37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a survey at Yuan Ze University felt that the two-year General English curriculum did not help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One of the ways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y be through ability-grouping courses that place ESL/EFL learners according to their proficiency levels (Lee, 2009). The findings of Lee (2009) suggest that ability-grouping teaching effectively promoted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Lee (2012) conducted a research among 107 college students who attended a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Half of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English majors and the other half were non-English majors. They were all placed in advanced level of sophomore English class.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investigate their perceptions for sophomore English curriculum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Lee (2012) found the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ability-grouping courses for sophomore English. However, non-English majors were more passive in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Non-English majors did not make as much progress as English majors (Lee, 2012).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preparing students to take a specific test is accepted in real classroom settings (Boldt & Ross, 1998; Robb & Ercanbrack, 1999; Shin & Seong, 2011; Wadden & Hike, 1999). Robb and Ercanbrack (1999) showed that non-English majors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their scores on the reading section of the TOEIC test. For listening skills, many researchers supported the idea of providing effective listening input to

enhanc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ncrease learners' exposure to difference accents through audio materials (Harmer, 1998; Thornbury, 2006). However, some researchers questioned the validity of scores gained by using treatments (Smith, 2000; Willis, 2000). Thus, score improvements through TOEIC preparation cours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cautiously.

## Method

###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from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of EFL learners (N = 81), twenty-two males and fifty-nine females, from two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classes taught by the same instructor at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ocated in central Taiwan. These students were all non-English majors, includ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formation science, applied Chinese,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finance and law, tourism,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who obtained certificates of CSEPT at the CEF/B1 level during their freshman year. There were originally 90 students in these two classes, but only 81 of them completed the TOEIC pretest, posttest, and two monthly on-line TOEIC tests. Therefore, data collected from those students who finished all four tasks was considered valid.

### Materials and Procedure

Textbooks used for the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were *English for Life & Work Book 3* published by AMC Group and *Complete Guide for the TOEIC Test* (3<sup>rd</sup> Edition) published by Heinle. The two-hour weekly class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hour on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 Book 3*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s and the second hour on TOEIC test-taking skills covered in *Complete Guide for the TOEIC Test* (3<sup>rd</sup> Edition) with listening and reading practices.

The TOEIC test includes two par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There are sentences about photographs, stimuli—response,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short talk questions in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The reading section includes sentence completion, passage completion, and short passage questions. It takes approximately forty-five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100 items in the listening section and one hour and fifteen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100 items in the reading section. A TOEIC pretest which includes 100 listening questions and 100 reading questions was administered in class on the third week of the semester because the class list was finalized that week. Practice Test 1 offered in *Complete Guide for the TOEIC Test* (3<sup>rd</sup> Edition) was used as the pretest material.

---

The posttest was administered in class on the sixteenth week of the semester using Practice Test 2 in *Complete Guide for the TOEIC Test* (3<sup>rd</sup> Edition) as the testing material. These two practice tests “resemble actual tests in terms of format, content, and level of difficulty” (Rogers, 2006, p. 3).

## Results

### Analysis of TOEIC Pretest and Posttest Overall Scor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total TOEIC scores o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are shown in Table 1. As can be seen, the mean score of the pretest was 440.86 with a SD of 353.44; and the mean score of the posttest was 457.22 with a SD of 105.88. The mean score increased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posttest. A t-test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was significa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osttest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 ( $p = .000$ ), implying that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overall TOEIC scores after the training.

Table 1

####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OEIC Overall Score*

| Test/ (n)     | <i>M</i> | <i>SD</i> |
|---------------|----------|-----------|
| Pretest (81)  | 440.86   | 353.44    |
| Posttest (81) | 457.22   | 105.88    |

Note:  $\alpha = .05$

### Analysis of TOEIC Pretest and Posttest Listening Sec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TOEIC listening scores o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are shown in Table 2. As can be seen, the mean score of the pretest was 269.01 with a SD of 66.20; and the mean score of the posttest was 280.56 with a SD of 71.38. A t-test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was significa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osttest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 ( $p = .000$ ), implying that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TOEIC listening scores after the training.

Table 2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OEIC Listening Section*

| Test/ (n)     | M      | SD    |
|---------------|--------|-------|
| Pretest (81)  | 269.01 | 66.20 |
| Posttest (81) | 280.56 | 71.38 |

Note:  $\alpha = .05$

## Analysis of TOEIC Pretest and Posttest Reading Sec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TOEIC reading scores o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are shown in Table 3. As can be seen, the mean score of the pretest was 171.85 with a SD of 48.80; and the mean score of the posttest was 177.16 with a SD of 57.62. The mean score increased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post test. A t-test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was significa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osttest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 ( $p = .000$ ), implying that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TOEIC reading scores after the training.

Table 3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OEIC Reading Section*

| Test/ (n)     | M      | SD    |
|---------------|--------|-------|
| Pretest (81)  | 171.85 | 48.80 |
| Posttest (81) | 177.16 | 57.62 |

Note:  $\alpha = .05$

## Discussion

### Discussi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on Overall TOEIC Scores

As shown in Table 1, overall TOEIC posttest scores were only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TOEIC pretest scores, 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still significant. These outcomes revealed that for non-English majors, one semester of TOEIC preparation through focusing on test-taking skills for an hour per week was insufficient to raise their scores to the 500 level. TOEIC 500 was a goal set by the English committe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for non-English majo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 was a mere 16.36. There are two probable reasons for these results. First, though placed in the elite group, the non-English majors tend to be more passive in their English learning than their

English-majorpeers (Lee, 2012). Second, outside the EFL environment, non-English majors have more limited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If the class time is their only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English, improvement in their TOEIC scores will likely be limited.

## **Discussi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on TOEIC Listening Section**

Participants' listening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able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score in the listening section was 11.55.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lassroom listening practice and test-taking skill instruction were effective.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the listening scores was not very impressiv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from the listening section may suggest that longer periods of study are necessary to meaningfully elevate EFL learners' test scores.

## **Discussi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on TOEIC Reading Section**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reading section were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reading score was only 5.31.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ppear to show that the test-taking skills covered in the course were not effective. However, after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answer sheets, it became clear that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finish answering all of the 100 questions in the reading section. This is likely due to the slow reading speed of the participants. These participants had passed the CEF/B1 for the CSEPT but not the B1 level of the TOEIC. As non-English majors, their reading proficiency and speed wa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at of English majors. Since the time allowed for the TOEIC listening section was forty-five minutes, by the time they finished the listening section, they were quite tired. When challenged with another 100 reading questions, most of them could not finish the task at this level. Thus, many questions went unanswered or answers were guessed. This may have lead to lower scores in the reading section of the TOEIC test.

## **Implications and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appears to have been effective. Participants improved their overall TOEIC scores as well as both their listening and reading scores. However, the score improvement in each section was only slightly significant. Students actually improved more on their listening proficiency than reading

---

proficiency. Test-taking skills instruction was meaningful, but enhancement of reading speed should probably be added to the curriculum. Instructors also need to encourage non-English major learners to practice listening and reading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ite sophomore English courses for non-English majors yielded TOEIC score gains for participants. Although the posttest overall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s, the results were only slightly significant. Participants improved more on their listening proficiency than reading proficiency. The improvement in the listening section was 11.55 points compared to only 5.31 in the reading section. Because many of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finish all the questions in the reading section, instructors should include reading speed and material focus on reading in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est-taking skills covered in the textbooks.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volve more non-English majors from more universities and increase the dur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more robustly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ability-grouping sophomore English courses.

##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Since the study was only conducted with a small sample and within a short time, its results should not be generalized to larger population and other settings. Further studies could involve more non-English major participants from more schools. The du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may also be expanded to investigate long-term results.

## References

- Boldt, R., & Ross, S. J. (1998). *TOEIC Research Report Number 3*. The Chauncey Group International LTD., Princeton, New Jersey.
- Chang, Y. Y., Liu, Y. P., & Chen, C. W. (2006, November). *Teaching subject courses in English at the college level: Perspectives from profess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e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 Chien Tan, Taipei.
- Harmer, J. (1998). *How to teach English*. Harlow: Longman.
- Lee, C. L. (2009). 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ability-grouping teaching i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in central Taiwan. *Journal of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3*(2), 23-40.
- Lee, Y. N. (2012). Research on advanced sophomore English at OCU.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OCU Conference on Applied English Teaching* (pp. 38-51).
-

- Liauh, Y. H. (2010). Preliminary study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exit English examination in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29(3), 41-60.
- Miyata, R. (2004). A review of TOEIC: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methods, and purpose of TOEIC, including its effect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Bulletin of Peppu University Junior College*, 23, 59-69.
- Rogers, B. (2006). *Complete guide to the TOEIC test*. (3<sup>rd</sup> Ed.). Boston, MA: Heinle.
- Robb, T. N., & Ercanbrack, J. (1999).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direct test preparation on the TOEIC scores of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ESL-EJ*, 3(4), 1-22.
- Shin, Y., & Seong, M. (2011).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TOEIC courses based on teaching strategies.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1, 207-228.
- Thornbury, S. (2006), *An A-Z of ELT*. Oxford: Macmillan Education.
- Tsao, C. H., & Hsu, C. H. (2010). The English-learning needs of techn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Fooyi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n 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9), 60-72.
- Wadden, P., & Hike, R. (1999). Comments on Liz Hamp-Lyons' ethical test preparation practice: The case of the TOEFL. *TESOL Quarterly*, 33(2), 267.
- Willis, J. (2000).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ask-based learning. *The Language Teacher*, 24(2), 7.
-

# 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黑色幽默語言\*

許嘉雯

## 摘要

在八〇年代後期的大陸文學裡，小說本身的存在性逐漸增加。許多作者試圖凸顯小說與現實世界的界線，讓書寫敘述成為另一種語言，一種有別於現實的「後語言」。這種盛況到了九〇年代的王小波（1952-1997）「時代三部曲」，更是顛覆了傳統的文字規則，語言不僅是表情達意的媒介，同時也是作者書寫的重要對象。然而在他刻意明快的黑色幽默句子中，不難發現作者依舊試圖拆解已被「毛話語」綑綁多年的話語機制，藉由胡說八道將話語系統重新定位。作者不停地使用符號（sign），但其能指（signifier）指涉的所指（signified）卻在重複迴旋的小說架構中無限擴大、延伸，無從明確定義，卻也無從被束縛，換句話說，「黑色幽默」不僅是王小波特有的書寫風格，更是為了藉此抵抗無所不在的「毛爸爸」，讓失語的危機轉化成另一種話語存在的可能性，修正或瓦解既存的秩序，將八〇年代的抵抗意圖依舊傳承下去，而這些符號虛化的文字不斷地累積而成的「黑色幽默」空間，正是王二們，或說曾受毛語創傷的作家們，他們真正思想之所在。

**關鍵詞：**王小波、時代三部曲、黑色幽默、毛語創傷。

---

\* 本篇論文以本人碩論《一場文學與歷史的辯證——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為基礎，重新耙梳黑色幽默的思潮脈絡和文革的語言邏輯，這兩者對王小波書寫文本的影響，希冀能因此掌握王小波黑色幽默策略以及背後的書寫意圖。

許嘉雯：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投稿日期：101年6月25日接受刊登日期：102年7月29日

# Black humor style of Wang Xiao-bo's "The trilogy of times"

Chia-Wen Hsu

## Abstract

0 age later periods, Many authors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e line between the novel and real world, and let writing become to another language which is a kind of "meta-language" being different to the reality. This grand occasion to 90 age's Wang Xiao-bo (1952-1997) "the trilogy of times", the language not only expresses the meaning the medium, simultaneously but becomes to a important writing object for author. In the sprightly black-humor sentence, he attempted to destruct words mechanisms of "Mao's language" held back many years, and locate a new words system with nonsense talks. The author does not stop using "sign", but "signifier" Refers to fords "signified" extends and expands infinitely inside the recounting repeated novel construction. It cannot be defined explicitly and restrained. In other words, "Black-humor" is not only Wang Xiao-bo's unique literature style, it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resists "Mao-daddy" omnipresent, let the aphasia the crisis turn another language existence the possibility, the revision or disintegrates the order which already saves, inherit 80 age's resistance intentions. "Black-humor" space that these sign empty writing accumulates unceasingly becomes, is the true thought is at place that precisely "Wang Er's", or said the writers once received attacks the "History's humor".

**Keywords:** Wang Xiao-bo, The trilogy of times, Black humor, Trauma of "Mao's style".

## 壹、前言

八〇年代後期，大陸文學風貌開始了另一個新的階段，小說本身的存在性逐漸增加。許多作者已不甘於情節的發展與結局，進而著眼在「小說」本身真實／虛構的矛盾點間，試圖凸顯小說與現實世界的界線，讓書寫敘述成為另一種語言，一種有別於現實的「後語言」(meta-language)。<sup>1</sup>如此一來，小說的神聖正當性不再，寫作變成了一種玩樂遊戲，過去嚴肅的政治性功能，此刻已成為可拆解的文字遊戲，嚴謹的「結構」已被「解構」取代。作家捨棄以往備受推崇寫實意義下的線性邏輯，反向採取看似隨機組合的塊狀敘述，不僅打破傳統文章的起承轉合，更將平面文字的延展性與包容性，作各類實驗性質的發揮，尋找足以表現新時代的美學模式。

因此，敘述文字不再只是書寫工具，它已成為作家個人獨特的風格標誌，「見其文，如見其人」的作品處處可見，如余華（1960-）的暴力美學、蘇童（1963-）的陰森幽麗，皆是個人所獨有的特色，不同的聲音也讓「小說熱」的中國文學，掀起一場盛大的文字饗宴。這種盛況，到了九〇年代的王小波（1952-1997）「時代三部曲」，更是打破了傳統的文字概念。<sup>2</sup>在其文本裡，語言不僅是表情達意的媒介，更是作者書寫的重要對象：故事的進行只是為了增加敘述行為本身的平面空間，小說劇情已不再是作者創作的焦點所在。

「時代三部曲」是臺灣風雲時代出版社為王小波出版的套書名稱，分別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各自收編的作品有：

1. 《黃金時代》：〈黃金時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時期的愛情〉、〈我的陰陽兩界〉。
2. 《白銀時代》：〈白銀時代〉、〈未來世界〉、〈二〇一五〉。
3. 《青銅時代》：〈萬壽寺〉、〈紅拂夜奔〉、〈尋找無雙〉

這些皆是臺灣最為熟知的王小波作品，也是本篇論文論述的主要對象。<sup>3</sup>

---

<sup>1</sup> 語言學家 L.赫爾姆斯列夫把「後語言」(又譯為後設語言)界定為一種語言，與世界上的非語言事實、情境或對象無關，而涉及另外一種語言：這是一種以另一種語言做為對象的語言。而在小說實踐中，這另一種語言既可以是日常話語的紀錄，或是文學系統自身的「語言」，包括作為整體的小說成規，或是樣式的特殊形式。帕特裏莎·渥厄 (Patricia Waugh)；錢競等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5)，頁 4-5。

<sup>2</sup> 王小波，1952 年生於北京，在經歷大躍進、文革、留美歸國之後，開始從事寫作，1991 年〈黃金時代〉初試啼聲，即得到聯合報文學獎，直至 1997 年因心臟病猝死，已有數十篇小說發表。

<sup>3</sup> 除了以上所述作品，為了更能貼近和完整解讀王小波作品，本篇論文尚參考了 1.中國青年出版社

在這些作品裡，不僅是文字規則的顛覆，就連文字的表達方式都充滿戲謔的姿態，「胡說八道」即是王小波鮮明的個人風格特色。他本人曾不只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黑色幽默是他創作的主题之一，原因是文章本來就是要笑，不笑就沒意思了：

在我的小說裡，……真正的主題，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邏輯是：我們的生活有這麼多的障礙，真他媽的有意思。這種邏輯就叫做黑色幽默。我覺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氣質，是天生的。我小說裡的人也總是在笑，從來就不哭，我以為這樣比較有趣。<sup>4</sup>

的確，王小波的文本裡總是隱藏著令人發笑的因素，而這些通常是來自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嚴肅與沉重，面對這些障礙，王小波反用輕鬆的角度去思索、嘲弄，去除了應有的悲傷，自成一格的黑色幽默風格成為文章脈絡的支骨所在。

然而不只是王小波，早在 80 年代的黑色幽默風潮中，許多作家無意抑或有意之間，皆以詼諧的態度去看待暴力事件，死亡只是某種存在狀態，早已失去了真實性與恐懼感。這種純粹的寫作更是悖離了大陸官方原本主張的寫實路線，但是在大陸的「黑色幽默」真的等同於一般幽默的定義嗎？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許多新時期的小說家嘗試以看似滑稽，實為激烈的暴力敘述，運用了先前推崇的壯烈雄渾（sublime）「毛話語」結構，塑造出幾近崇高的烏托邦式美感，再與低下污穢的排泄物並置，形成英雄歷史與猥瑣人性的詭譎辯證論述：革命是合理必要的暴力行為？或只是血肉橫飛的人性殘酷見證？

這樣八〇年代的「黑色幽默」創作似乎是背負著巨大的政治意義：用文字思索暴力合理化的歷史傳承，但是反觀自承「黑色幽默」傳統的王小波「時代三部曲」，其述說的對象始終不明：自言自語，或者有所顧忌？這種文本始終不散的吊詭氣氛和其刻意幽默明快的語言，互相交織出曖昧不明的敘述風格，有別於 80 年代大陸文學明確的政治意圖，這其中是否有不為人知的機轉使之改變？或者在王小波手中，具有強

---

2002 年出版的《黑鐵時代》，裡頭有多篇生前從未發表的早期作品、改寫的唐人故事（其中〈紅線盜盒〉和〈紅拂夜奔〉），王小波之後衍生出《青銅時代》裡的〈萬壽寺〉、〈紅拂夜奔〉、發表於雜誌上尚未出版的短篇小說、《東宮·西宮》電影與舞臺劇劇本以及未完成的〈黑鐵時代〉；2. 同是中國青年出版社於 1997 年出版的散文集《沈默的大多數》；這些作品皆包含在本論文所探討的王小波作品範圍。

<sup>4</sup> 王小波：〈從《黃金時代》談小說藝術〉，《沈默的大多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316。

---

烈批判意味的「黑色幽默」意涵已然消逝，剩餘的就只是單純的嬉笑怒罵？這些疑問都值得我們思索討論。

然而王小波運用「黑色幽默」的寫作意圖，在前人的碩論發表中並未受到注目。臺灣研究王小波的相關學位論文有三：許嘉雯碩論《一場文學與歷史的辯證——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討論王小波小說與文革歷史情境，彼此的關聯和呼應。<sup>5</sup>游秋宴碩論《王小波〈黃金時代〉之暴力敘事與成長啟蒙》則以王小波單一作品〈黃金時代〉為解讀對象，並未擴至王小波所有作品。<sup>6</sup>林靜宜的《規訓下的狂歡——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則是以巴赫汀的嘉年華狂歡理論、傅柯的身體規訓，這兩種理論為論述的切入角度。<sup>7</sup>這些學位論文並未針對王小波黑色幽默語言做更深入的討論，因此為了更能貼近王小波的思想轉折，本文將以王小波文本作為主要探討對象，從其獨樹一幟的語言風格和書寫模式，以瞭解黑色幽默的展現方式，進而瞭解其黑色幽默背後所隱藏的當代社會思潮脈絡和文壇的反制企圖。

## 貳、黑色幽默的流變

### 一、黑色幽默的構成與闡發

「黑色幽默」一詞是出自於法國布勒東（Andre Breton, 1896-1987）在 1939 年出版的《黑色幽默文集》（*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sup>8</sup>其中他以「黑色幽默」作為編選作品的條件，但在書中卻未見明確的定義，但在閱讀《黑色幽默文集》的時候，不難發現布勒東挑選小說的標準，是遵循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對幽默的意義架設而成的。佛洛伊德認為幽默是一種移置（displacement）機能，當人的心靈受到重大傷害，而無法順利排解時，只能仰賴遺忘或是轉換至較無關緊要的事物上，以擺脫憤怒、無力等負面情緒的侵襲，是一種精神昇華的自我心理機制。<sup>9</sup>因此黑色幽

<sup>5</sup> 許嘉雯：《一場文學與歷史的辯證——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臺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2月

<sup>6</sup> 游秋宴：《王小波〈黃金時代〉之暴力敘事與成長啟蒙》，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2年6月。

<sup>7</sup> 林靜宜：《規訓下的狂歡——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臺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2年6月

<sup>8</sup> 「黑色幽默」一詞在更早之前便已出現，但那只是一種術語的應用。直至布勒東，才開始嘗試為此建構出一套完整的體系，故在此以布勒東作為爬梳「黑色幽默」論述的起點。

<sup>9</sup> 佛洛伊德：《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知書房，2000），頁241。佛洛伊德認為所謂的「凝縮」（condensation）以及移置作用，是潛意識在夢中所產生的慾望滿足方式，然而這兩者都具有

默的作品，幾乎都伴隨著重大創傷事件而來，如二次大戰、越戰等殘酷的非自然事件，讓這些戰爭背後的人為因素，在符號化空間中展露，更顯示出其行為的荒謬可笑。

到了六〇年代，美國文壇因越戰的發酵作用，反體制的現代主義思潮更形蓬勃，許多作家以諷刺幽默的筆法去思索戰爭的意義，而其中所製造的文學空間，皆以荒謬、絕望的悲觀姿態存在著，如海勒（Joseph Heller, 1923-1999）的《第二十二條軍規》（1961）、馮內果（Kurt Vonnegut, 1922-2007）的《第五號屠宰場》（1969）等等，大量作品的創作造就了美國「黑色幽默」文學的高峰期。

這時期的「黑色幽默」文學，病態、古怪、荒誕等負面的消極情緒，已成為其創作思想的基調，具體的現實災難以及樂觀的正面態度不再是描述的重點，它只是一個仲介的符號，文學家藉此表現出人類愚鈍、可悲的普遍宿命，讓人「先暢懷大笑，然後回過頭來以恐懼的心理回顧他們笑的一切」。<sup>10</sup>這已完全不同於布勒東的主張：化痛苦於快樂。

1978年文革結束的中國，原本被「紅色經典」長期霸佔的書架上，開始有了他者文本的空間，大量西方經典的翻譯以及多種書籍的出版，皆是為了滿足人們長期的「精神飢餓」，為此大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學盛況。「黑色幽默」即在這個風潮中正式在中國登場，直至今日儼然成為大陸文壇的熱門專業名詞。然而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黑色幽默」早已被誤讀、誤用，絕非是美國六〇年代理論的直接移植，例如奚沙（Terry Caesar）在〈平瓊在中國〉（"Pynchon in China" 1984）一文中，提出移植到中國的黑色幽默觀念根本已經變質，例如美國作家不將個人與世界的疏離視為道德層次，但中國評家或作家剛好相反；又或者中國評家在引述西方黑色幽默作品和理論時有斷章取義的疑慮等等。<sup>11</sup>如此一來，在中國大陸的「黑色幽默」已呈質變的狀態。

嚴格來說，這種「擬仿」（mimicry）現象必然發生，畢竟彼此的社會背景及政治環境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中國學界原本藉由想藉由複製（copy）一直接引進西方文化加以利用，然而在文化背景不同的思路下，源自於外國思潮的片段話語容易變成「似

---

某種因扭曲而形成的荒謬可笑效果，這正和幽默技巧相仿，因此佛洛伊德也將這兩者視為幽默背後的動機與作用。

<sup>10</sup> 施內德勒：〈海勒談自己〉，《作家新聞》1981年，頁73。

<sup>11</sup> 關於奚沙對中國黑色幽默的判斷與理解，賀淑璋則有相當精闢的論述。詳見賀淑璋：《黑色幽默在中國——毛話語創傷與當代中國「我」說主題》，（臺北：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比較文學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98-118。

---

是而非」的歧義橫生狀態，這是可以預期的文化轉換現象。<sup>12</sup>

況且，即使黑色幽默的本質已有改變，但對大陸作家而言，「黑色幽默」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創作方式，它還提供了一套新的話語體系——「yes……but……」這種先認同，而後才表現懷疑與保留的述說方式，可讓知識份子在政治箝制下尋求至較隱晦的發聲空間，讓看似無害的玩笑成為掩護自己真正意圖的保護色，避免了自身的政治危機。於是知識份子盡可能曖昧地遊走於服從／反抗之間的模糊地帶，才能消解失語危機、避免踏入政治批判的陷阱中無法動彈。

所以在黑色幽默小說中，創作者會刻意強調其荒謬、渾沌的部分，企圖營造出一個與現實相悖的虛擬空間，以規避對號入座的尷尬，例如王小波作品中描寫未來的《白銀時代》以及改編唐傳奇的《青銅時代》，都將故事背景遠離現實生活的時間刻度，自然也遠離了可能隨即而來的政治風暴。黑色幽默即成為作家的保護色。但在這種「故事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的標籤下，又在有意無意之間，提出它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如同王小波曾說：「黑色幽默，我認為無須刻意為之，看到什麼，感覺到什麼，把它寫下來，就是黑色幽默。這件事當然非常地有意思。<sup>13</sup>」所謂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指無論多麼荒誕、怪異，這些「黑色」部分都是確實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並非作家虛構而成，如此一來，聲音與背後的沈默皆產生意涵，構成了話語的多重性。

然而。多重話語固然可以明哲保身，卻也因曲折委婉而無法清晰有力，失去了批判的準確度，文學的積極意義似乎消失。如此一來，這樣的文學作品是否背離了文革之後大陸文壇強調針砭時政、反省現實的寫作意圖？成了嬉笑怒罵的空洞文章？面對這點的疑問，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思索，王小波是如何重新詮釋黑色幽默，以凸顯出文學與歷史之間的辯證關係。

## 二、王小波對於黑色幽默的反思

王小波在《黃金時代》後記中，他曾提到自身的小說主題並非一般人所認為出於虛構：

---

<sup>12</sup> 雖然「擬仿」大多專指於殖民地文學對於帝國話語的潛意識反抗現象，但是非殖民地的中國，西方文化輸入卻帶有強勢的侵略姿態，並不是單純的兩國文化交流的平等關係，故可以作為「擬仿」定義衍生後的對象。

<sup>13</sup> 王小波：〈與人交流——《未來世界》得獎感言〉，《沈默的大多數》，頁 320。

我相信讀者閱讀之後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主題就是我們的生活；同時也會認為，還沒有人這樣寫過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是我寫的這樣，但實際上，它正是我寫的這個樣子。<sup>14</sup>

在王小波的心中，「黑色幽默」並非虛構，而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之所以會被忽略，只因為人們往往只看到自以為是的事物，便獨斷地判定其中對錯，而忘了思索與求證。例如《青銅時代》〈尋找無雙〉王仙客到宣陽坊找尋表妹無雙，但人人都「知道」那座廢棄的宅子以前是個尼姑庵，沒有叫做無雙的姑娘，還信誓旦旦述說以前的情形：

有關這座尼庵的故事是這樣的：過去這庵裡供奉著觀音菩薩，香火極盛。長安城裡多少達官貴人的夫人、太太，都來這裡上香。後來庵裡的尼姑不守清規，爭風吃醋，鬧出人命來，官府就把這庵給封掉了。<sup>15</sup>

即使王仙客質疑為何尼庵門前有兩個擺場面的上馬石，況且佛門中人是不能騎馬等不合理之處，但他們仍然堅持原本的記憶，直至王仙客到別處得知宣陽坊從來沒有尼姑庵，眾人才改口說是一座道觀，過去的主人是魚玄機，之所以會瞎編故事，是為了要打發王仙客的死纏爛打，若要真的歸咎起來，都是王仙客的錯，他不該試圖喚醒大家都不願想起的過去，才會造成每個人的困擾。

這種自以為是的邏輯觀念，幾乎都存在於王小波每個文本，是非對錯的嚴謹性似乎已被瓦解、消抹掉了，僅以權威話語為最高準則。然而在那個紛擾、恐懼的時代，王小波體認到「官方話語」的不可信，為了避免落入敘述圈套中，於是他選擇不聽、不說，沈默成為他的標誌。這種無語的沈默，皆顯示於他文本裡的主角王二，即使他們總是被迫「交代」、「書寫」，也都用自己的話去說，顛覆當時國家話語的規範，例如〈黃金時代〉王二大寫特寫他與陳清揚的「敦倫」（故意誤寫成郭倫）過程；〈革命時期的愛情〉則是以扭曲的身體姿態，呈現無可言喻的創傷等等。

直至在文革之後的「新時期」文學，「敘述語言」本身的真實性開始遭到質疑。文學家發現語言本身即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它會隨著當權者的使用或禁止而改變，許多真相即在話語的不斷轉變中，隨之消失或扭曲。因此若要反抗強權，則需先突破「一

<sup>14</sup> 王小波：〈後記〉，《黃金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 257。

<sup>15</sup> 王小波：〈尋找無雙〉，（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 9。

言堂」的困境：將語言視為一套獨立系統，極力拆解、消弭背後的政治意義，才能將語言符號回歸正確的書寫位置。因此為了避免過去話語暴力的影響，王小波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一個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你只要很樸素地寫出來，讀者自然會體會。你要是把它渲染了以後呢，倒是有一種『濫情』的嫌疑。至於很輕微的事件倒是可以舉一反三地渲染一下，這是我的一種風格。<sup>16</sup>

「黑色幽默」獨特的敘述重點轉移手法，不僅可以擺脫「毛文體」的絕對簡潔，更能讓讀者擁有思考的空間，進而創造出多聲的敘述文本，因此王小波才會採取「黑色幽默」遊移不定的敘述模式，讓敘述語言脫離政治的箝制。

除此之外，王小波也將當時的知識份子處境和思想加以著墨。由於長年思想的壓抑與控制，從不敢想到不能想，知識份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王小波卻拋卻了沈痛的訴求方式，反以黑色幽默來顯示這荒謬的情境。正如〈似水流年〉的主角李先生，一個熱愛祖國的歸國華僑，在文革期間因海外背景遭到許多非人的待遇：挨鬥、下幹校等等，面對這些痛苦的折磨，李先生最後終於找出結論，這一定是他印度師兄搞的鬼，讓他一直做惡夢不能醒來：

想到我在大陸遇到的這些事，又是血腫，又是托派，又是滿頭大包，實在比迷信還古怪。……我寧願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第一個可疑份子就是我大學時同宿舍的印度師兄。有一回我嫌他在房間裡點神香，就鑽到廁所裡弄點聲音給他聽，一連扳了七八下抽水馬桶。這下把他得罪了，他就叫我做起惡夢來，一夢三年不醒轉。<sup>17</sup>

敘述者王二在文章一開頭就點出李先生是個很具有邏輯性的歸國學者，他曾對「龜頭紅腫」這種詭異的論點，洋洋灑灑寫下一大篇論說文與人爭辯，展現出恣意縱橫的氣度。但在一連串的政治打壓下，失去了原有的自信，變成一個隨波逐流的失意者，他並未對政策發出任何不信任的聲音，只是將自己遭遇視為一場延續三年還未醒來的夢魘，甚至他還提出例子加強自身的理論：

<sup>16</sup> 王柏華：〈輕快而沈重的跳躍——談王小波對小說的理解〉，《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頁48。

<sup>17</sup> 王小波：〈似水流年〉，（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170。

當時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別關照說，附近的農民老來偷糞，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誰在幹這不病而獲的事。李先生堅決執行，結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擔，幾乎打癱瘓了。……堂堂一個 doctor……回到大陸來，保衛東，保衛西，最後保衛大糞。『如果這不是做惡夢，那我一定是屎殼郎轉世了！』<sup>18</sup>

殘酷現實磨滅了知識份子對國家政治的熱情，也讓他們該有的理性邏輯，被扭曲成政治運作下的附屬品；單一空白的思想是那時文人的通病，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哀。因此依照原先的政治邏輯，任何人都不能正確地判斷對錯，因為根本就沒有正確的標準，於是王小波選擇照實寫出生活，以當時的邏輯與態度去思索一切，而成為小說的主題，不加任何評斷，只是這些東西寫出了之後，即成為人們眼中的「黑色幽默」，形成一大諷刺。

另外，即使東西文化彼此之間擁有極大的差異，但「黑色幽默」的絕望姿態，從美國延續至中國大陸，並無太大的改變，作家依舊對現有體制感到失望與無助，早已失去了積極的意義，僅存戲謔（joke）的遊戲敘述。例如余華的〈現實一種〉一文中，暴力與血腥只是小說場景的一部份，負面情緒如憤怒、悲傷，已經被抽離，看似煽情的故事情節，經由冷靜客觀的敘述之後，皆被簡化成單純的文字，一連串失去表情的平面符號。

但是反觀王小波的創作，雖然其作品也有相當的「黑色」成份，如死刑、暴虐的情節描述並不少見，但在故事的進行之中，作者會不時透過敘述者發聲，添增了許多個人的主觀情感色彩，以沖淡故事的戲劇張力（因此王小波的雜文和小說語言，幾乎相似且重疊）。而且不管小說的發展是多麼悲慘，在文章的最後，王小波都會留下一絲明亮，在絕對的黑暗中，露出了希望，如〈紅拂夜奔〉文末寫著：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件事能讓我相信我是對的，就是人生來有趣，過去有趣，內心有趣卻假裝無趣。也沒有一件事能證明我是錯的，讓我相信人生來無趣，過去無趣，現在也無趣，不喜歡有趣的事而且表裡如一。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只能強忍著絕望活在世界上。<sup>19</sup>

強忍著絕望活在世上，只因希望仍然微薄地存在，這最後的結論，不僅將悲劇感

<sup>18</sup> 王小波：〈似水流年〉，頁 172-173。

<sup>19</sup> 王小波：〈紅拂夜奔〉，（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 285。

減弱，表現出王小波本身的積極態度，不同於其他作家的消極悲觀。而這種反轉結束幾乎都出現在所有的文本中，像〈似水流年〉最後王二回顧了許多往事，想到了許多悲慘故事，而心生疑問，是否有必要寫下，供後人察看這個時代的悲哀：

如果決定這樣去寫似水流年，倒不患沒得寫，只怕寫不過來。這需要一支博大精深的史筆，或者很多支筆。我上哪兒找這麼一支筆？上哪兒去找這麼多人？就算找到了很多同伴，我也必須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寫。這樣我就有機會在上天所賜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桿，證明我是個好樣的。但要作這個決定，我還需要一點時間。<sup>20</sup>

在這裡所謂的「似水流年」，是從《追憶似水年華》書名轉化而成的，指的即是文革時期的各種回憶。雖然敘述者說出許多寫不過來的理由，並且需要多一點時間來作決定，但是這個文本本身的存在，不就是證實了他的決定。也因此，日後王小波辭去教職，專心致力於寫作之上，當初阻止他的理由，成為一種反覆論證的過程，看似悲觀為難，實為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勇氣的表現。

由此可知，「王小波式的黑色幽默」並非完全否定人性和政治，反而在戲謔的外表下，隱藏著不欲人知的寫作目的，一個嘗試表達自身想法的積極精神，藉由寫作，讓自由和理性的成分，灌注於文章之中，並非只是一種文字遊戲。在他筆下，幽默不僅只是一種心情，而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畢竟當世界荒唐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它，同樣是荒唐的，但若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來消解它，反而更能凸顯其中的詭譎無理。當然，絕對的漠不關心是無法做到的，這種幽默並非全然的消解，而是另一種更為巧妙的反抗，王小波即為我們展現出另一種更有深度的黑色幽默。

## 參、王小波「黑色幽默」的創造

### 一、口語化風格

王小波的遺孀李銀河曾提到王小波的語言是相當犀利幽默，妙趣橫生，是一種極具個人特色的文字。<sup>21</sup>雖然這是針對其雜文隨筆的文字特徵，但若引申到他的小說，不難發現王小波語言策略的運用，並無太大的變動，看似粗糙隨意的口語化文字，依舊大量充斥於其中，且獨斷地反映出敘述者的個人意識，形成小說的散文化風格。舉

<sup>20</sup> 王小波：〈似水流年〉，頁 246。

<sup>21</sup> 李銀河：〈前言〉，《沈默的大多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2。

例來說，在〈尋找無雙〉裡，敘述者王二提到關於自身存在意義的問題，苦惱地自我調侃，這個段落即是典型的「王二用語」：

以前我住在地下室時，有時候感到寂寞難當，日子難熬，就想道：一定有個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應該對我的存在負責，所以他也該對我現在的苦惱負責任。所以我就對他（你可以叫他我的上帝，我的守護神，或者別的什麼）抱怨一番：你瞧你把我放在這個地方，到處都是笨蛋！叫我怎麼活啊！這樣想了以後，很快就得到了回應：你少嘮叨兩句吧，我也煩哪。<sup>22</sup>

在這約兩百字的段落中，王小波即重複使用了「你」、「我」、「什麼」等等口語文字，讓原本嚴肅的哲學及宗教話題，轉以戲謔、詼諧的角度去看待，消解了問題的沈重感，也讓他的幽默感表露無遺。同樣的，在別處也有類似的筆法，如〈革命時期的愛情〉王二在回憶文化大革命時，即單純地敘述出這個荒謬、瘋狂的世界：

好多大喇叭在聲嘶力竭地嚷嚷，而且都有好多人死掉了。但是我一點都不哀慟。我喜歡的時代忽然降臨了人世，這是一個奇蹟。我們家都成了蟑螂窩，絕不會有人嫌棄我的廢銅爛鐵。再也沒有比這更叫人高興的事了。至於它對別人是多麼大的災難，我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管得著嗎？<sup>23</sup>

在面對文革這個具有重量感的歷史背景，王小波依然運用講話的方式敘述，文中出現許多語助詞：「了」、「嗎」、「呢」等等，使得文字的意義漂浮不定，無法定義。這種看似粗糙隨意的文字不斷出現，以致於其小說形成一種講述（telling）的狀態，而非顯示（showing）的情節描寫，敘述文句失去精準，也打破了傳統小說結構的完整性。作者的權威不再，文本開始產生空隙，敘述者藉此脫離作者的掌控，不再沈默，對話因而產生，形成雙重對話的敘事空間，這二重語言的敘述，正是「後設小說」（meta-fiction）自我指涉的特質。<sup>24</sup>

所謂的自我指涉，是一種以小說探究或印證小說理論的書寫方式。福波（Stanley

<sup>22</sup> 王小波：〈尋找無雙〉，《青銅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178。

<sup>23</sup> 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黃金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76-77。

<sup>24</sup> 帕特裏莎·渥厄（Patricia Waugh）認為後設是所有虛構固有的傾向或功能，為了就是滲透融入真實世界的不穩定性。所以後設小說會試圖破壞精確語言描寫的意圖，用看似粗糙的口語化取而代之，更能顯現文字所能表達的缺乏、貧困。帕特裏莎·渥厄（Patricia Waugh）；錢競等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頁6-15。

Fopel)認為後設小說家藉由小說本身，探究此一文學架構的諸多創作層面，例如語言、情節和角色的運作、作家／作品／讀者間的互涉關係。<sup>25</sup>不斷的文本探究，不僅打破了傳統小說的絕對完整性，也突顯出小說的虛構與存在感。藉此，在敘述過程中，王小波的小說一直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如〈紅拂夜奔〉、〈萬壽寺〉、〈未來世界〉等等，敘述者王二隨時出現於文本之中，中斷故事的進行，迫使讀者停止或延緩閱讀的速度，進而質疑故事的絕對真實性，以及對於敘述者觀點的再詮釋，形成一個多方互動（包括作者、敘述者、主角和讀者）的開放性文本。

同樣的，在「時代三部曲」中，敘述者會不斷的顛覆或補充之前的敘述，進行「再解讀」的動作，因此會經常出現類似的句式：「有關……的事情還可以補充如下……」、「關於……一事還有另一種說法」、「有關……，我有好多可以補充的地方……」等等，不斷的「再講述」，形成一種迴旋式的敘事語法，讓故事結構呈現出一種躁動、不安定的狀態，而非傳統小說常見的穩定、完整的敘事框架。如〈未來世界〉就多處運用了這個敘事策略。書中敘述者「我」取消身份之後，被安置到拆遷區，因為新工作太疲累，薪資也太少，就想考個電工來賺錢。作者寫完此事後，接著補充了關於考電工的事情：

有關我想考電工的事，還有必要補充幾句。人到了我這個地步，總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還能作什麼。作為一個物理系的畢業生，很容易想到去考電工。<sup>26</sup>

爾後，當敘述者「我」偷了建築材料，作了一張雙人床，又寫：「那張床是這樣的……」補充了一段作床的經過。<sup>27</sup>接著在描述我與學妹的情愛關係時，也寫道：「有關我學妹的情形，有必要補充幾句，她是洋人叫做『tomboy』那一類的女孩子，而且脾氣古怪。有時候我跟她玩，但沒有過性關係。有關自己的情況也有必要補充幾句，在遭安置，更確切的說，被她打一拳以前，我是最擅長於強詞奪理，後來就什麼都不想說。那一拳也值得形容一下，……」<sup>28</sup>。

不斷的敘述，反而造成閱讀延緩的效果。而這種句式，不僅〈未來世界〉，在王

<sup>25</sup> 張惠娟：〈臺灣後設小說理論〉，王鍾陵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文論精華：小說卷》，（石家莊：河北教育，2000），頁484。

<sup>26</sup> 王小波：〈未來世界〉，《白銀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頁150。

<sup>27</sup> 王小波：〈未來世界〉，頁167。

<sup>28</sup> 王小波：〈未來世界〉，頁169-170。

王小波的每部小說中幾乎都出現過類似的敘述模式，甚至小說本身的結構，就是呈重複（replay）的狀態，像〈黃金時代〉一文即是一種回憶過程，在回想之中，敘述者王二不斷的重複同樣的事件，但每次的描寫都從不同的角度去還原事實，彌補了之前敘述的不足之處。而這種回憶／現實交錯的文體結構，同樣地也出現在其他的文本之中。這種不斷反芻的敘事模式，無論篇幅長短，始終讓王小波的小說呈現出濃厚的說理氣氛，作者使用大量的口語化句子，一再重複的思索、驗證，以不同的角度複述大致相同的故事內容，試圖還原個人內心意識的流動軌跡，其小說的故事情節，反而成為小說的敘述背景，不再是主要的敘述主題，換句話說，王小波在創作小說時，與其說是在描述故事的內容經過，倒不如是一種個人寫作意識的重組與再現。

## 二、狂歡的身體展示

在王小波小說裡，會加以補充、多次敘述的情節，通常都只是故事的枝微末節，而非重大的事件；若牽涉到嚴肅的話題，敘述者反而是輕輕一筆帶過，或是輕鬆的筆調談論，讓敘述重點不斷失焦，模糊了文章的創作意圖，進而形成一種視序遊移的文本結構。例如：〈似水流年〉賀先生因批鬥被打的傷痕累累，受不了折磨跳樓身亡，家屬想找出打人的兇手，但目擊者劉先生卻說不清楚，支吾其詞：

別人問他是誰打的，他也說不太清楚，因為誰想起來都去打兩下。只單單把鳳師傅點了出來，倒不說他打的狠，只說他帶黑皮手套，拎根橡皮管子，一邊打一邊摸，弄得人怪不好意思。<sup>29</sup>

劉先生這番說詞，讓殘酷暴力的批鬥場景，「再現」成一場充滿性暗示的狂歡化情境，歷史的神聖性早已消弭於無形之中。然而，通常以文革政治作為探討背景的文學作品，會經常性使用悲憤、吶喊的口吻述說當時身不由己的悲哀，即使到了 80 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強調以「零度情感」的筆調將文學視為藝術品呈現的先鋒作家，在美學的理性探索下，依舊不自主地流露出惶惶然的時代感喟。然而王小波卻反其道而行，將這時代許多人共有的歷史傷痕「脫冕」轉化為粗鄙卑下的肉體傷口，與排泄、性愛等最汗穢的器官並置，如痔瘡、陽痿、性虐待等等難以啟齒的隱疾或癖好，且佐以一大堆看似胡說八道的話語，讓沈重的歷史弱化成小說家不斷越界的嘲仿對象，藉此顛覆了大陸文學自「十七年文學」（1949-1966）以來慣有的「革命歷史」經典化的

<sup>29</sup> 王小波：〈似水流年〉，《黃金時代》，頁 168。

敘述傳統：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將光明的歷史圖景投射於虛無飄渺的未來。<sup>30</sup>

歷史的「再現」終歸只是虛構的政治想像，傷痕累累的肉體卻是真實存在的，於是面對滔滔史話，王小波用荒誕不羈的字句，直言不諱人體最隱穢的私處，以暴露出「紅光亮」正統敘事的假象。因此，〈似水流年〉同為被批鬥對象的李先生，他不言政治的不公，只為「龜頭紅腫」之事連篇累牘地寫下多篇大字報與人爭論。〈革命時期的愛情〉接受思想再教育的王二，只是將批鬥大會視為「到會場上去磨屁股」<sup>31</sup>，未曾提起與會者的暴力行為：

不管你是誰，磨屁股你肯定不陌生。或者是有人把你按到了那個椅子上，單磨你的屁股，或者一大群人一起磨，後一種情形叫做開會。總而言之，你根本不想坐在那裡卻不得不坐，這就叫磨屁股。

……眼前最大的痛苦是磨屁股。在我看來，既然生存的主要方式是比賽磨屁股，那麼我們這些生來屁股窄的人就處於不利的地位。<sup>32</sup>

被批鬥的王二竟只在意痔瘡帶來的折磨，對於政治迫害也只是輕描淡寫，未加以批判或者控訴，最後還與代表政府權力的女長官 X 海鷹發展出虐待／被虐的性關係，原本莊嚴肅殺的政治場合，瞬間成了肉欲橫流、兒女情嗔的私領域，因性欲而導致的權力轉換——王二「奉命」成為虐待者，和女長官進行一場 SM 的性遊戲——著實將至高無上的當局政權嘲弄了一番。

同樣的場景，也出現在〈二〇一〇〉，主角王二因「party」辦得太盛大，「在每個房間裡都留下用過的避孕套，蒐集起來裝了半垃圾車」。<sup>33</sup>所以那些患有陽萎的上級，在妒羨交雜的情緒下，決定將主辦人王二處以鞭刑，以示懲戒。他和女同事藍毛衣一同赴刑場，卻在電視轉播的畫面裡，面對著人們的偷窺，他們把身體扭曲成太極圖的樣子接吻，而藍毛衣更是脫掉衣服讓他撫摸她的乳房，以坦蕩蕩的性愛姿態與權力網

<sup>30</sup> 黃子平指出大陸五十至七十年代所生產的文學作品，統稱為「革命歷史小說」：從革命到解放到繼續革命，對歷史的想像不僅詮釋新中國的過去，也預告它烏托邦的未來。這種大歷史的史詩作品，在長期大量刊行之後，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儼然成為一套不容忽視、否定的「正統話語」。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sup>31</sup> 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黃金時代》，頁 60。

<sup>32</sup> 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黃金時代》，頁 60、91。

<sup>33</sup> 王小波：〈二〇一〇〉，《黑鐵時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530。

絡對抗。

王小波這種獨樹一幟的黑色幽默，在改編唐代傳奇的多篇小說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如取材於〈紅線傳〉的〈紅線盜盒〉，將被譽為「俠義小說」的傳奇，變成一齣荒誕不經的笑鬧劇。原本身懷大權，運籌帷幄的節度使薛嵩，搖身一變成了無人可供使喚的山寨小頭目；為了攻打苗人，他穿著「二指厚海獸皮鑲鐵的重鎧，頭戴一頂熟銅大盔，背插銀裝鋼，腰懸漆裏鐵胎大弓和一壺狼牙箭，手提七十斤重的渾鐵大槍，騎在棗騮嘶風馬上」，<sup>34</sup>全副武裝的他，卻在酷熱的夏天裡中暑，還被迫像小丑一樣赤裸地躺在他人面前。至於紅線雖然武功依舊高強，卻從聰慧的美貌侍婢變成一個胡攪蠻纏的女子，兩人之間的對話和心態，在在都顯露出荒謬、可笑的氣息。舉例來說，當薛嵩和紅線被刺客追殺，困在山頭，紅線因疲累打起了瞌睡，薛嵩將她叫起：

薛嵩用肘捅她一下說：『賤婢，這是什麼所在，汝尚敢瞌睡乎？我輩的性命只在頃刻！』紅線大著舌頭說：『小賤人睏得當不得，你老人家只得擔待吧！』說完她一頭睡倒，再也叫不醒。

……薛嵩用腳踢了她腰眼一腳，這下不僅醒過來，而且火了：『混賬！我剛睡著！你他娘的又是大人，又是老爺，把便宜都占全，值一會夜就不成嗎？老娘又跪你，又拜你，又喊你老爺，又挨你打，連覺都不能睡？我偏要睡！』說完她又睡倒了。<sup>35</sup>

從完全服從的「小賤婢」至撒潑野蠻的「老娘」，紅線這一段言語，不僅虛化了當權者薛嵩的權力象徵，更將歷史的嚴謹性完全推翻，造成文本之中的空隙，作者與歷史的對話就此成立。

另外在〈紅拂夜奔〉中，王小波更是將威權君主的人格，降格成如一般粗俗不入流的地痞流氓，一心只會想到性這方面，毫無帝王的風度與見識。例如作者講到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對仇人的報復手段就是強要他太太的身體，即使仇人的太太已經人老珠黃，誓言尋死，他也想盡辦法讓她活下來逞欲。<sup>36</sup>而身為日本國王的虬髯客，則

<sup>34</sup> 王小波：〈紅線盜盒〉，《黑鐵時代》，頁 171。

<sup>35</sup> 王小波：〈紅線盜盒〉，頁 177。

<sup>36</sup> 王小波：〈紅拂夜奔〉，《青銅時代》，頁 217。全文如下：「比方說朱洪武，打下了天下，就把陳友諒的原配抓去當老婆。那位老太太早就過了更年期，不僅不想過性生活，而且很不想活，首先她不肯吃飯，想把自己餓死，所以洪武爺從北平請來了填鴨師傅，每禮拜填她兩次。其次她不肯痾屎，想把自己憋死，所以隔三差五要給她灌腸。再其次，她坐著不肯動，想要坐出痔瘡流血而

是一個喜歡偷窺女子洗澡、強迫后妃彼此發生性關係的變態，即使別人痛罵他，他也當作聽不懂，依然故我，繼續進行對女體想像的實驗，只是在性慾滿溢卻始終得不到滿足的氣氛下，對女體的想像讓叫髯客的肉體有著巨大的變化，變成了一隻不知饜足的魚人怪物。有趣的是，在「時代三部曲」裡，代表當局握有權力的上級長官，都是這種徒有性慾，卻失去性行為行動力的非人怪物（怪人），也因此他們對於赤裸的性愛肉體，總有著愛恨交織的複雜情緒：帶著莊嚴的假道學面具，卻又無法抵抗這種真實感的偽善顛覆。

這些特有的黑色幽默用語和修辭，固然讓「時代三部曲」裡始終縈繞著縱欲狂歡的歡樂氣氛，其對性愛的直接敘述，更是引起不少的批判聲音，但仔細觀看，即會發現其背後對中共固有的歷史時間觀，其實是有著強悍的批判意識。文本中藉古喻今、傳奇新編的故事發展，只不過是構畫出「時代三部曲」的敘述情節，拓展出可供作者敘述的文本空間。小說不再是現實生活的某種反映媒介，反變成一種以語言構成的自足實體，而故事情節只是小說敘述文字背後的模糊風景，文本所敘述的重點，並非劇情、人物的遭遇，而是主角的幾近科學邏輯式的答辯。但是不管文革時期、未來時期，或者唐朝時期的王二們，即使他們面對問題滔滔雄辯、理直氣壯，但其思路卻是始終在問題的原點上打轉，為了找出正確答案，在文本裡王二們所寫的虛構故事必須不斷地重新開始，讓他們在虛擬的文本空間裡得以不斷的辯證，然而，過多的語言文字，在不斷重複之下，只是暴露出符號的虛妄無能：當世界已沒有正確答案時，又要如何思辯、尋找真理呢？

於是，王二們在面對政治權力的糾葛、迫害，只能欲言又止，或言不及義，或意猶未盡，或沒完沒了，永無止盡的胡說八道，且以「黑色幽默」方式的述說粗鄙的性愛或排泄話題，因為相對於漫天撒地的詞彙運用，或許肉體才是真實的存在。

## 肆、「黑色幽默」背後的「毛語創傷」

許多文學批評家在探討八〇年代的大陸文學時，都不約而同地同意其對「毛語創傷」的反省與重置企圖。所謂的「毛語創傷」，是指在 1949-1975 之間知識份子長期受到「毛話語」的浸淫之下，失去了自我意識的創傷經驗。由於「毛爸爸」的存在始終如影隨形，不僅無法擺脫，卻也無法割捨，戀／弑父情結構成了作家的擺盪，於是失

---

死，所以只好派了宮女拎住她的耳朵，使她走動。最後她不肯讓洪武爺近身，所以每次要用二十個人把她按住。」

---

語和失憶的空白，不斷地浮現於文學之中，但伴隨空白而來的卻是血腥、暴力的大量描寫，為何暴力會成為大陸作家描寫的對象？其中和毛語創傷有何關連？歷史在這弔詭的關係之中，扮演著何種角色？而這對於王小波的「黑色幽默」手法，又有何影響？八〇年代的反思是否在六四事件之後消逝？這些問題都是這一小節我們所要探討的重點所在。

### 一、「毛話語」的特性

所謂的「毛話語」，不單是毛澤東本人的語言，它泛指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泛意識型態的語言。<sup>37</sup>1949 至 1976 年之間，大陸文壇上慣用的文字符號幾乎都是來自於「毛話語」系統裡，例如「文藝思想鬥爭」、「歌頌——暴露」、「香花——毒草」、「思想改造」、「文藝黑線專政」等等這些特別用語。這些源於「毛話語」的詞彙共同特性是彈性空間不大，使用者不能任意改變、修改，並且情感色彩強烈，具有極強的煽動人心效果。<sup>38</sup>

為何毛話語會有這麼大的影響，以致於整個文壇都被籠罩其中？除了毛澤東本人喜用類似言語著作作品，為當局廣為流傳，如毛語錄幾乎是人手一本，在重要場合常被引述，作為辯論的依據；另外也是因為在這段時期，大陸是相對封閉的思想空間，幾乎沒有引進他國思潮，使得知識份子只能從當局容許的一元話語成長，自然會以此作為為個人使用語境。

「毛話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即逐漸成形，不容置疑的絕對邏輯是其明顯特色。對於擅長煽動人心的毛澤東而言，具有高度情緒的簡單語言是其利器，因此他的文章充滿了暴烈的字眼，例如他最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可見一斑：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sup>39</sup>

毛澤東在文章中，採取了類似演講的敘述方式，不斷的呼喊口號，不僅讓人印象深刻，更能挑動聽者的情緒，以致後來中共政府皆使用這樣的方式宣傳政策，創造出

<sup>37</sup> 賀淑璋：《黑色幽默在中國——毛話語創傷與當代中國「我」說主題》，頁 68。

<sup>38</sup> 關於這些詞句的定義和用法，詳見洪子誠等編：《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sup>39</sup>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運動〉，《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 19。

獨一無二的戰爭思維文學。

這種二分思維到了 1949 年中共建國之後依然沒有改變。爾後因胡風事件，知識份子更是受到壓抑，許多文學家因此被迫無異議接納，而導致幾近瘋狂的失語境界，不是不能寫作（如沈從文 1902-1988），<sup>40</sup>就是無法從「毛話語」解放出來（如路翎 1923-1994），<sup>41</sup>話語竟成為最大的暴力工具，而這種暴力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頂峰。

何謂語言暴力？劉再復曾為其訂出了定義：

所謂的語言暴力，是指以語言為武器進行人身攻擊與生命摧殘的暴烈現象，也可界定為暴力在語言中的表現。<sup>42</sup>

由於語言的傳遞功能，能讓暴力藉此達到攻擊他人的效果，形成一種恐怖行為，加上和政治權力的結合，促進權力話語和語話權力的一體化型態，語言暴力從此成為在位者話語的潛在基調，不但鞏固了專政的政權，也劃分了思想的容許範圍，若有人執意跳脫範圍之外，立即會遭到污蔑性的語言攻擊。

如此明顯的暴力箝制，勢必會引起部分有志之士的反抗，但是「毛話語」能長時間讓群眾完全信服並且遵從，是因為它撫慰／暴力的雙重性，令人無法立即把握實質的緣故。一方面，「毛話語」作為極權主義的紀律，來反對一切膽敢在它控制範圍之外的東西，然而另一方面，它卻慷慨提供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玫瑰色風景，讓人民沈迷於他所架設出的宏大遠景，進而崇拜、臣服。<sup>43</sup>撫慰變成暴力的遮蔽面，「毛話語」這種既迷惑又強暴的雙重性，確實同化了許多人的情緒與理想，私人的渴望被淹沒於大我之中，一切皆以國家利益作為前提。而這種強烈蠱惑性的語言，不僅存在於文學作品，甚至伴隨著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深入民間生活，不斷地重複運用和學習，成了一般人民平常思考的邏輯秩序。如此一來，「毛話語」即是一切事物的精神標準，它是一切意義與價值的標竿，成為了至高無上的精神指標。

<sup>40</sup> 蘇煒：〈「白紙」非白——略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語文革前十七年大陸文學〉，《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邵玉銘等編，（臺北：聯經，1995），頁 270-307。

<sup>41</sup> 王德威：〈三個飢餓的女人〉，《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頁 248。路翎因胡風案入獄，平反之後再度執筆，產量雖大，但千言萬語皆是重複「毛語」的陳腔濫調，已不復當年《飢餓的郭素娥》的犀利文采，這可能是他在多年監禁下心智失常的徵兆。

<sup>42</sup> 劉再復：〈論語言暴力--「語言暴力」現象批評提綱〉，《明報月刊》2001 年 4 月，頁 22。

<sup>43</sup> 楊小濱：〈先鋒文學與「毛語」的創傷〉，《二十一世紀》1993 年 12 月，頁 45。

## 二、王小波與「毛話語」的再詮釋

如前文所述，「毛話語」具有暴力與撫慰的雙重性，導致深受影響的作家無法脫離明顯錯誤的二分邏輯。但是到了八〇年代，「新時期文學」讓知識份子重新反思，許多作家選擇拆解、切割語言，讓意義空泛，成為一連串失去存在感的符號，以脫離「毛話語」的束縛。王小波即是在各類文本中不斷顛覆「毛話語」，並伴隨著黑色幽默的風趣文筆，試圖消解了「毛話語」的神聖性。例如在 1968 年 11 月 19 日《光明日報》山林火災的新聞，便是採取毛話語邏輯，敘述人們「奮力」救火的過程：

火光就是命令！四連指導員們高聲朗讀毛主席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的教導，……立即行動，向火場飛奔。

戰士寧福連人小志大，……大火把他包圍了。……在這生死關頭，戰友們看到他在烈焰中站起來，從肺腑中發出一聲高呼：『毛主席萬歲！』然後又向烈火滾去。<sup>44</sup>

在不該帶有情緒的新聞文字裡，卻是充滿了激烈的「毛話語」語句；在這些奮不顧身的人們心中，「毛主席萬歲」這句話就如同宗教的祝禱詞，具有某種信念依附的神力，能讓人藉此超越肉體的痛苦，以犧牲奉獻作為人生最高的信念價值，死亡的悲劇性也因此被塗抹掉，剩下的僅有英雄主義的高歌及讚揚。然而在王小波的文本中也有相似的事件，如〈似水流年〉敘述者王二所經歷過的「毛話語」神奇之處：

我在雲南住醫院，鄰床是一個肺癌。他老婆早就關照上啦：他爹，要覺得不行，就喊一聲，對我對孩子都好哇。結果那人像抽了瘋，整夜不停地喊：毛主席萬歲！鬧的大家都沒法睡。直到把院長喊來了，當面說：你已經死了，剛才那一聲就算！他才嚥了氣。<sup>45</sup>

若將這二段文字作一比較，不難發現這種狂熱的英雄主義，在王小波的筆下已成為王式幽默的基本元素之一，原本充滿悲壯的官方語言，在此被轉化成滑稽、荒謬的場景。不變的是，「毛主席萬歲」這句話仍然操控了人民的生死大權，在火場救火的知青為此壯烈犧牲，而遠在雲南的卑微小人物，卻為了妻兒的安全，久久無法瞑目，

<sup>44</sup> 嚴家其、高阜：《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1990），頁 388-389。

<sup>45</sup> 王小波：〈似水流年〉，頁 218。

與其說是對毛主席的忠誠表現，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恐懼情緒：不說，就會失去一切。為了更清楚王小波黑色幽默和毛話語的連結，以下將以「新時期的毛語反思」、「六四之後的文學反響」等時間劃分，討論兩者之間的關聯。

### 1、新時期的毛語反思

王小波作品有許多以大字報為敘述對象。大字報原本就是大量採取標語的敘述模式，聳動的簡短字句，不僅能讓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還能激起人群的強烈情緒，形成一種掌控群眾的權力，況且文字的書寫即是自我思想的展現，在群眾的觀看下，撰寫者會有被觀看的權力快感，因此大字報越寫越多，措辭也越來越激烈，其權力機制越趨明顯。〈似水流年〉一文，即將這種暴力凸顯出來：

六七年大家都想寫些大字報貼出去，然後看見別人在自己寫的東西面前交頭接耳，議論紛紛。這和我今天想發表作品的心情是一樣的。頂叫人憤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寫了一夜，才貼出去就被人蓋掉。所以都在大字報上寫著保留五日，保留十日；無奈根本沒人給你保留。那年頭為這種事情吵嘴、動手的事也不知有多少。<sup>46</sup>

激動的人們為了表達自我的意見，只能不斷的述說，卻又不甘淹沒於他人的聲音之中，這種與他人思想、行為的衝突，最後勢必會演變成肢體的暴行。

身體成為表演的場所，肢解、傷殘變成家常便飯，特別的是，王小波更將其轉換成性的層次，因此小說的男主角們不是陽痿，就是龜頭紅腫，不然就是在性中扮演著被虐待的角色，自行閹割的情結躍然紙上，因為面對強大的「毛爸爸」，男性作家只能去除自我的生殖器官，放棄控制的權力，讓自身的筆（*pen*）不等於自我陽具（*penis*），再以「毛話語」系統訴說意義，成為「毛爸爸」的傳聲筒，才能與其和平相處，進而製造出片面的和平假象。

除了先前所提到的新聞和大字報之外，日常生活的各種領域，都無法擺脫這種意識結構的規約，形成一種荒謬的現象，〈黃金時代〉主角的二分邏輯，即是個明顯的例子。在〈黃金時代〉一開頭即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敘述文字：敘述者王二被隊長誤會，以為是他打瞎他家母狗的左眼，為了不讓隊長給他小鞋穿，王二嘗試用推理方式去證明自己的清白無辜：

---

<sup>46</sup> 王小波：〈似水流年〉，頁 158。

我想證明自己的清白無辜，只有以下三個途徑：

- 一、隊長家不存在一隻母狗；
- 二、該母狗天生沒有左眼；
- 三、我是無手之人，不能持槍射擊。<sup>47</sup>

有趣的是，這三種證明方式皆是絕對而不容置疑的，並無相對的可能性。在王二的世界裡，「是」與「否」之間，僅剩下一條界線，早已失去了灰色地帶，只要存有可能性，他就不能脫離嫌疑，因此在「隊長家確有一棕色母狗，該母狗的左眼卻是後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槍射擊，而且槍法極精」<sup>48</sup>的狀態下，他無法辯駁，只能接受。

一連串的推演，卻推論出「什麼都不能證明的結果」，但是在文後王二隨即說出兇手是羅小四，並且是他親眼所見：

當然，這隊裡槍法好的人還有不少，其中包括羅小四。氣槍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隊長的母狗時，我就在一邊看著。但是我不能揭發別人，羅小四和我也不錯。何況隊長要是能惹得起羅小四，也不會認準了是我。<sup>49</sup>

看似玩笑的廢話，卻因事實的揭發而有了不同層次的印證答案。王二和隊長早已知道真相，但是他們卻依然按照那個絕對邏輯去思索問題，忽略了「眼見為憑」這最有力的證據，事實不再重要，意識型態才是那個「黃金時代」所在意的事物，而這些正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思索狀態。

在無法辯白，面對強加罪名的情況下，王小波採取了另一種反向思考方式，「既然無法證明，就讓自己不無辜」，於是乎王二打瞎了母狗的另一隻眼，而對待和陳清揚通姦的謠言，他也落實了罪名，變成名副其實的犯人。乍看之下，這樣做有種自暴自棄的意味，但反觀當時的狀態，不難發現王小波極力讓自己擺脫掉那時意識型態的框架，因為當你要為自己辯駁的時候，就已經承認原初判定的合理性，並把自己處於被審判的位置上，且依照對方所制訂的規則進行，讓這種審判和被審判的遊戲得以展開，就如同老鬼（1948-）的《血色黃昏》（1987）之中，判定有罪／證實清白的邏輯

<sup>47</sup> 王小波：〈黃金時代〉，頁 6。

<sup>48</sup> 王小波：〈黃金時代〉，頁 6。

<sup>49</sup> 王小波：〈黃金時代〉，頁 6。

推演模式一般，<sup>50</sup>無疑是落入了「毛話語」的窠臼之中。

為了擺脫社會意識型態的束縛，回歸個人的自由特質，於是王二選擇犯下罪刑；不同的是，他是出自個人意願，唯有如此才能超脫社會規範，站在超然的制高點上，以戲謔的態度去觀看這個「黃金時代」。所以面對審判者，王二從未開口辯護，皆用沈默作為回答；即使接受懲罰寫交代材料，他也「像專業作家一樣寫起作來」，描寫他們如何「敦偉大友誼」的細節，用粗鄙的性愛語言，瓦解了官方語言（即交代材料）的嚴肅及正當性，反襯出「毛話語」霸權的可笑形象。諷刺的是，在證實主角兩人的親密關係之後，原本指責女主角是破鞋的聲音反而消失，因為「大家對這種明火執仗的破鞋行徑是如此害怕，以致於連說都不敢說」<sup>51</sup>。過於真實反而無法面對，畢竟那時話語剩下的僅有粗糙煽情的戰爭語言，早已失去傳達真相的能力，所使用的詞彙意義貧乏至無法訴說赤裸裸的現實，只能運用於虛假的政治場合。

## 2、六四之後的文學反響

「毛話語」這種單一絕對價值的語言系統，在「新時期文學」成為反思的對象，但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後，文學界突然變成眾矢之的，許多作家流亡海外，或遭受審查；政治介入不僅打亂許多作家的寫作計畫，也讓許多文學聲音瘖啞、模糊，失去了應有的焦點，如莫言在《檀香刑》（2001）的後記寫著：

在本書創作的過程中，每當朋友們問起我在這本書寫了什麼時，我總是吞吞吐吐，感到很難回答。直到把修改後的稿子交到編輯部，如釋重負地休息了兩天之後，才突然明白，我在這部小說裡寫的其實是聲音。<sup>52</sup>

文學意圖被迫隱藏至「突然明白」的字句中，避免「關愛」眼神之情切溢於言表，而其他被號為先鋒作家的余華、蘇童等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也一直不斷改變自身的寫作方式，甚至必須不斷自我表明政治忠誠並未改變，才能阻擋外界的質疑聲浪。「新時期文學」語言的探索實驗，成為昨日黃花的過往。

<sup>50</sup> 《血色黃昏》是部半自傳的小說，作者老鬼是《青春之歌》作家楊沫之子，在內蒙下鄉之時，因得罪領導而捱整，《血色黃昏》即是描寫當時他為自己辯護的過程情況。此書完成於 1978 年，因對當時官僚制度的描寫太過直接，直至 1987 年才得以出版。有趣的是，在田松與王小波談〈黃金時代〉的對話錄裡，王小波認為《血色黃昏》是虔誠的，而自己從十七歲開始就不具有虔誠的氣質了。

<sup>51</sup> 王小波：〈黃金時代〉，頁 6。

<sup>52</sup> 莫言：〈後記〉，《檀香刑》，（臺北：麥田，2001），頁 469。

巨人已逝，箝制依然存在，在這樣詭譎多變的政治氣氛下，王小波也不能避免地改變書寫策略，其成名作〈黃金時代〉於 1991 年問世得獎，但這部描寫文革的作品，在 1992 年大陸出版時，是以《王二風流史》作為書名，編輯社成功地將作品的著眼點轉移至性愛描寫，而非禁忌的政治背景。爾後，王小波在創作之際，也巧妙地將故事背景延伸至遙不可及的未來——《白銀時代》，或是遠古的唐朝——《青銅時代》，極力規避了對當局挑釁的可能性。話雖如此，在王小波的筆下，批判鋒芒依然存在，只是被隱藏於彎彎曲曲的「黑色幽默」邏輯迷宮中，在無法明說書寫意圖的曖昧敘述之下，文字本身變成展現暴力的場所，大量語言符號的使用，仍然意在摧殘讀者的慣用思維，以瓦解話語的威權力量。

所以在《白銀時代》與《青銅時代》書中，敘述者王二從未直言現實政治，他只是嘮嘮叨叨說一些風馬牛不相干的事，如數學、邏輯等等純科學的專業知識，但文本中始終透露出一絲詭異的氣氛。在自由論述的背後，似乎都有某種力量操控著，如在〈白銀時代〉，敘述者王二在寫作公司上班，專職寫作一篇名為《師生戀》的稿子，即使已經寫了十幾次相同的版本，但在寫新的版本時，王二卻清楚的知道故事發展是不能更動，即使開端有千百種的寫法，但結局只有一種，一切都被制約規範，毫無期待也毫無自我：

不管我樂意不樂意，我都得回到最初的故事，揭開這個謎底：就像自瀆一樣，你可以想像各種千奇百怪的開端，最後總是一種結局：兩手黏糊糊……我討厭這個謎底。<sup>53</sup>

雖然厭惡，但王二依然只能按照遊戲規則進行，因為只要寫出不同的東西，「他們」就會進行關切，在數十道的反覆修改之後，最後出版的依舊是第一版的模樣。在此所謂的「他們」，文中是指王二所在的寫作公司，實際上暗喻著當局政府，<sup>54</sup>雖然文本中從未正式敘述，但「他們」卻是無所不在，無論在公司中還是生活之中，政府就如同沒有臉的幽靈一般，無聲無息地控制著一切，而這條晦暗不明的敘述主線，隱然成為〈白銀時代〉看似胡亂堆砌文字之間的連結點。這種意在言外的敘述方式，不僅

<sup>53</sup> 王小波：〈白銀時代〉，頁 16-17。

<sup>54</sup> 在現實生活中，中國大陸有「中國作家協會」的官方組織，各省都有分會，專職作家幾乎都是其會員，大約有四千多名，政府付給薪水以維持這些藝術工作者的基本生活，類似國家公務員的制度，和〈白銀時代〉的公司制度相仿，王小波可能從此得到靈感。

營造出懸疑、曖昧的遊移效果，也適時地讓作者不受威脅的遠離政治風暴。

同樣的，在《青銅時代》的三篇小說也有著相同的黑色幽默基調，以〈紅拂夜奔〉為例，紅拂在自殺殉夫之前，必須到各衙門排隊辦理各種手續，且要有多餘的非正常死亡限定名額，在政府指定的死法下才能進行「殉節」動作，害得紅拂煩到快發瘋<sup>55</sup>。生命的存在與否已是公家機關的權力範圍之內，更何況人的其他基本權利，更是握於他人之手，自身是無法決定保護一切。雖說在六四之後，學術界的自由範圍縮減不少，但是在王小波的文本中，我們依然看到新的話語、新的思想，即使曖昧不明、隱而不晦，依然有著積極的論述力道，以黑色幽默的文筆抵抗「毛話語」的威權以及暴力模式，王小波的話語反制機能於焉浮現。

## 伍、結語

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故事背景，橫跨了歷史與未來，從唐代傳奇到未來的 2015 年，將時間的維度拉至了千年之久，然而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世界，無論是話語模式或社會氣氛，並無太大的差別，就連主角「王二」們的思考邏輯都是一樣，所經歷的事件也都相似，時間背景幾乎變成一種單純的平面敘述符號，而非故事的真正立體背景。細讀文本，不難發現故事發展幾乎只有一種模式，看似眾多，實為一人的「王二」們，皆不斷地陷入某種歷史輪迴的漩渦之中無法脫身逃離，即使在王小波的筆下，「王二」們不斷地越界自我嘲弄，或者在裝瘋賣傻的偽裝下嘗試重新定義話語的真正意涵，但在這看似廣闊，實為封閉的文本空間裡，所有的故事線性發展，皆形成一條徒勞無功的思索痕跡。

不斷地追尋、思考，卻依舊被綑綁於當時的話語體制中，這樣的無力感，正是呈現了「毛語創傷」對當代文人的分解凌虐。由於「毛話語」的暴力相向，不僅限制了話語的敘述機能，也切除了人們思考的連貫能力，混淆不清的指涉意義處處可見，人們不知也無從說起，沈默空白的背後，展現的是因無法宣洩而焦慮不安的社會情緒。然而在面對這樣嗜血的話語系統，有別於其他作家對其暴力的擬仿重塑，王小波卻是採取不斷的述說，且以慣用的「黑色幽默」方式，平白如話地重複敘述事件，「yes……but……」這種曖昧不明的敘事模式，不僅是作家個人的保護色，更是消解了話語的霸權威信。如此一來，黑色幽默不只是王小波個人的文字特色，更是為了抵抗日益嚴峻的政治氣候所採取的抵抗姿態。

---

<sup>55</sup> 王小波：〈紅拂夜奔〉，頁 58-60。

在「時代三部曲」中，我們看到作者作者不停重複地使用符號（sign），但其能指（signifier）指涉的所指（signified）卻在重複迴旋的小說架構中無限擴大、延伸，無從明確定義，卻也無從被束縛，換句話說，「黑色幽默」不僅是王小波特有的書寫風格，更是為了藉此抵抗無所不在的「毛爸爸」，讓失語的危機轉化成另一種話語存在的可能性，修正或瓦解既存的秩序，將八〇年代的抵抗意圖依舊傳承下去，而這些符號虛化的文字不斷地累積而成的「黑色幽默」空間，正是王二們，或說曾受毛語創傷，重新反省話語背後機制的作家們，他們真正思想之所在。

## 陸、參考書目：

### 一、王小波的著作：

#### （一）小說集：

1. 《黃金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  
——〈黃金時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時期的愛情〉、〈我的陰陽兩界〉。
2. 《白銀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  
——〈白銀時代〉、〈未來世界〉、〈二〇一五〉。
3. 《青銅時代》，臺北：風雲時代，1999。  
——〈萬壽寺〉、〈紅拂夜奔〉、〈尋找無雙〉。
4. 《黑鐵時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 （二）散文集：

1. 《沈默的大多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 二、參考書目：

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
  3. 佛洛伊德：《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知書房，2000。
  4. 帕特裏莎·渥厄（Patricia Waugh）：《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5。
  5. 洪子誠等編：《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6.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臺北：洪範，1989。
-

7. 莫言：《檀香刑》，臺北：麥田，2001。
8. 陳思和等編：《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1949-1999）》，臺北：聯合文學，2001。
9.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10. 嚴家其、高阜：《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1990。

#### 參考學位論文：

1. 賀淑瑋：《黑色幽默在中國——毛話語創傷與當代中國「我」說主題》，臺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
2. 許嘉雯：《一場文學與歷史的辯證——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臺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2月。
3. 游秋宴：《王小波〈黃金時代〉之暴力敘事與成長啟蒙》，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2年6月。
4. 林靜宜：《規訓下的狂歡——論王小波「時代三部曲」》，臺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2年6月。

#### 參考單篇論文：

1. 布勒東：〈第二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丁世中譯，《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柳鳴九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2. 施內德勒：〈海勒談自己〉，《作家新聞》1981年。
3. 余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臺北：遠流，2003。
4.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5. 蘇煒：〈「白紙」非白——略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語文革前十七年大陸文學〉，《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邵玉銘等編，臺北：聯經，1995。
6. 劉再復：〈論語言暴力——「語言暴力」現象批評提綱〉，《明報月刊》2001年4月。
7. 楊小濱：〈先鋒文學與「毛語」的創傷〉，《二十一世紀》1993年12月。
8. 王柏華：〈輕快而沈重的跳躍——談王小波對小說的理解〉，《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

# 修平科技大學《修平學報》徵稿要點

- 一、本刊為純學術性之刊物，專供本校同仁及校外人士發表研究成果及論著之用。
  - 二、論述及研究報告文字（含圖表），稿件分為理工類、商管類、人文社會類，以 30 頁為度；來稿須以 Word 格式排版，以電子郵件寄至學報編審委員會 (appear@mail.hust.edu.tw)(論文格式及版面規格，請至學報網頁下載)。
  - 三、無論中文或英文稿件皆須附上中英文題目、摘要，並註明作者姓名及系(所)職稱。他國文字稿件須附中文題目摘要，其字數以 500 字為度；並應列舉中、英文或他國文字之關鍵詞(keywords)。
  - 四、文稿之審查依據「修平科技大學學報評審辦法」。
  - 五、稿件格式按各專業學門標準格式或參考「修平學報論文格式」。
  - 六、作者投稿後，若在作業程序中因故取消投稿者，則其後兩期不再接受其投稿。
  - 七、所投稿件經編審委員審查同意刊登，稿件經刊印後，不得在他處刊印發表。如果已在其他刊物正式公開發表後，轉投本刊物，本委員會不負查核之責，相關著作權問題，由當事人自行負責。稿件若涉及一稿兩投或抄襲者，本學報得拒絕作者稿件 5 年。
  - 八、經審查採用之文章，排版後送請作者校稿，作者僅能修正排版印刷之錯誤，且不得擅自於校稿過程中增減內容。
  - 九、本刊每期以刊登 30 篇論文為原則，經審查後決議可刊登者，如超過篇數，則按最後定稿時間先後排序，安排至下一期刊登。
  - 十、本刊文之作者應對論文之內容及同意發表權之取得，負全部之責任。並請於投稿時即將「修平學報投稿授權聲明書」(附件)填妥後一併寄交。
-

---

十一、本刊文之作者應對論文之內容及同意發表權之取得，負全部之責任。若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請於接受刊登時即將「著作授權同意書」(附件)填妥後一併寄交。

十二、來稿經採用者，送當期學報光碟片 1 份。

十三、本要點經學報編審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

---

---

# 修平科技大學學報評審辦法

第一條 來稿之評審係由學報編審委員會遴聘校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

第二條 由執行編輯收稿、登錄及分類後，交由學術副校長挑選二名校外專業人士或學者進行評審。

第三條 每篇稿件原則上由兩位評審，每位評審除於評審意見表上陳述意見外，並需對稿件作出下述三項之一建議：

- 一、接受刊登。
- 二、修正後再審。
- 三、不予刊登。

第四條 依據前述審查意見，處理方式如下表：

| 處理方式          |       | 第 二 位 評 審 意 見 |         |         |
|---------------|-------|---------------|---------|---------|
|               |       | 接受刊登          | 修正後再審   | 不予刊登    |
|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 接受刊登  | 刊登            | 寄回修改    | * 第三位評審 |
|               | 修正後再審 | 寄回修改          | 寄回修改    | * 第三位評審 |
|               | 不予刊登  | * 第三位評審       | * 第三位評審 | 退稿      |

\*1.若第三位評審意見為「接受刊登」或「修正後再審」時，則請作者對不予接受之審查意見進行答覆外，將採兩正方評審意見予以刊登。

\*2.若第三位評審意見為「不予刊登」時，將採兩負方評審意見予以退稿。

\*3.任一評審審查意見為「修正後再審」，經函送投稿人日起計，逾3個月未回覆，該篇稿件以「不予刊登」處理。

---

---

---

第五條 本刊將針對審查意見及結果函送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第六條 評審作業相關人員，對評審委員身份應予以保密，以避免紛爭。

第七條 投稿人不得有打聽及干涉評審委員之言行。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報編審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

#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九月出版

---

發行人 鍾瑞國

出版者 修平科技大學圖書館校史組

地 址 41280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十一號

電 話 04-24961100

傳 真 04-24961187

編輯者 修平學報編審委員會

召 集 人—陳培中

編審委員—方世榮 江可達 林婉芳 張志凌

劉朝陽 鄧作樑

(依姓氏筆劃排序)

執行編輯—劉朝陽

印刷者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 40255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787 號 30 樓

電 話 04-22623893

傳 真 04-22623863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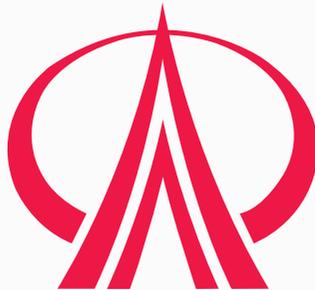
---

**HSIUPI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

VOL. 21  
September 2013



PUBLISHED BY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CHUNG, TAIWAN, R. O. C.

